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刊 总第七期



2012.5



目 录

Contents

研究与探索

4 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 傅 强
12 宋庆龄与爱国华侨蔡福就 郑培燕
16 中山先生一件小事 倪旅泉

馆建工作

18 故居的人与事 陆柳莺等
22 “长三角”红色旅游景区人员培训有感 夏义坤

宣教论坛

24 方言在讲解中的运用初探 许毅健
27 声名鹊起的名人故居 顾林华

陈展天地

29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游记 高海涛





馆藏研究

33　一个台钟的背后　宫洁菁
38　宋庆龄收藏的木刻版画　麦灵芝
44　馆藏部分西文图书疏记　王宁宁

文保之道

52　浅谈金属文物的保护　水　草
55　谈馆藏书画文物的保护　徐建华
57　受一次培训 沐十里春风
——参加藏品管理与信息化培训班感悟　花婆婆

藏书选译

60　《个人的历史》选译（连载）　郑培燕

资讯快车

70　故居新闻　夏义坤

图版

宋庆龄收藏的时钟　徐建华

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

撰文 / 傅强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作为宋庆龄最为信任的朋友之一，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接受宋庆龄嘱托，历经十载完成了一本时至今日仍是最具权威性的宋庆龄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在这本书中，爱泼斯坦将宋庆龄称为“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一个主张现代化的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榜样”，而宋庆龄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求过程也成为了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事实上，观察宋庆龄走过的革命道路，我们也发现，“现代化”也许并不是宋庆龄使用的最为频繁的一个概念，但的确是贯穿了宋庆龄一生的一条重要线索。尤其是在宋庆龄革命生涯的起点和接近尾声的时候，她都对中国的现代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正是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己任，她开始了自己革命生涯，而在生命的最后，她仍然将中国的现代化视作尚未实现但终要去实现的伟大目标。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就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展开一些研究和探讨。

“现代”与“现代化”——概念的辨析

“现代”和“现代化”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词汇，虽然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认为它们的含义是确定而明晰的，但事实上过于庞杂的内涵和外延使得这两个我们最熟悉的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了许多含混、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其实在西方文献中，与它们相对应的“modern”和“modernization”这两个词汇也是歧义颇多的概念，许多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或对它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界定。所以，在展开对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现代”/“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在历史语境中的嬗变进行梳理和辨析，这也将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宋庆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中对这一概念的使用。

汉语中的“现代”来源于英语中的“modern”一词，据西方学者考证，“modern”一词源于公元 4 世纪出现的一个拉丁语单词“modernus”，后者又起源于拉丁词“modo”，意思就是“目前”(the present)、“现在”(right now)、“当前”(recently)、“今天”(today)。“modernus”最早被用来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当时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后来一度成为基督教官方用

语。作为与古代相对立的带有比较性和历史性的“现代”（modern）是16世纪才开始流行，不过此时的“现代”（modern）并不意味着比古代“更好”，它仅仅是用来表明当下所处时代与刚刚逝去时代的不同，由于在当时古典时代被认为是理想的时代，所以此时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主义者”（modernist）恰恰是一种贬义的所指。

“现代”（modern）及其相关概念的贬义用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黑格尔开始把“现代”（modern）当作一个具体的“新时代”（new age），亦即现代社会来加以使用，用以指“大约1800年之前的那三个世纪”，它代表的是迈向未来的一个过渡。哈贝马斯也将“现代”（modern）界定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是“一种与古典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而这种新的时代意识是“通过更新其与古代的关系而形成自身的”，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由此“现代”（modern）被纳入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在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划分中，在一种以进步为目的的线性时间观念中，“现代”（modern）也开始被等同于诸如改善的（improved）、令人满意的（satisfactory）、有效率的（efficient）这些概念。[1]

由此可见构成“现代”（modern）这一概念有两大要素：1、“现代”意味着比“过去”更好；2、“现代”正是通过与“过去”的对立和分离来确立其自身的。

在现代汉语中，“现代”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约在20世纪初期，当时除了现代一词之外，人们还使用好几个类似词汇，来翻译英文的modern，如“摩登”、“时髦”、“近世”、“近代”等，至1930年代以后，“现代”一语才变得比较普遍。而由“现代”衍生出的“现代化”一词则最早出现在二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当时，柳克述在《新土耳其》一书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最早完整使用“现代化”一词的则是胡适，1929年，他在为《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1933年3月，陈序经发表《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再次使用“现代化”一词。

“现代化”这一提法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社会精英们关注的焦点，还是缘于1933年7月《申报月刊》组织的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既是二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延续，但同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又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代的那场论争。《申报月刊》专为此次讨论出版的“特辑”前言中写到：“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参加笔谈的学界名流大家围绕着“现代化的内涵”、“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些议题远远超出了纯学术范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现代化”意识的增强。[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讨论中，学者们开始用“现代化”一词描述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方向，或者说，开始将“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总问题来进行讨论，同时，人们不再以“西化”这一概念去描述中国的发展图景。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西洋的先进并不在于它是西洋的，而在于它是现代的，中国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在中、西之间去艰难抉择，而是需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向前走，“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冯友兰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次讨论也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现代化”一词不胫而走，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也持续

深入下去。

宋庆龄第一次正式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是在1927年8月22日在上海《申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她写道：“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这一工作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因为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不允许我们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采取逐渐改进的办法。”[3]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发现，宋庆龄不仅是最早一批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政治家，而且她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也是大大超前于同时代的人们。当人们刚刚开始接受“现代”/“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时候，宋庆龄已将中国的现代化视为最主要的目标，即只有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才能使之自立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当人们还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之时，宋庆龄就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敌人不仅是国内的“封建余孽”，帝国主义和殖民制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适合中国；当人们还在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争论不休的时候，宋庆龄早已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铺平。宋庆龄的这些观点的正确性，也早已为历史所证明。那么，为什么宋庆龄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会如此深刻而且超前呢？她的认识是否也经过一个蜕变的过程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进行一番梳理和研究了。

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

毫无疑问，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所受的西式教育，是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得以萌芽的沃土。其中，宋耀如所起的作用是不该被忽视的，正如爱泼斯坦所说，作为中国和美国两种潮流的独特的混合物，宋耀如是一个“热烈的主张现代化的人”，无论是传教、实业还是革命，这都与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促进者”的身份相关。而他的这个志向，也必然会融入到他对子女的教育中——这既包括他对子女教育方式也包括教育的内容。

在宋耀如离开美国21年后，他将女儿宋庆龄送上了驶向美国的海轮。从中国到美国，封建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开明，当年，正是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得宋耀如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化的积极促进者。可以想见这种对比也强烈地刺激着宋庆龄的心灵，引起她的思考。20世纪初叶，对进步的信仰，仍然是当时西方世界思想的核心，而从19世纪末开始在美国流行开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让这样一种进步蒙上了一层残酷的色彩——适者生存的逻辑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只有被淘汰的命运。从这样的观点来审视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处在十分危险的位置。于是我们看到宋庆龄开始在自己的论文中流露对中国现代化的热切期望。

在1911年发表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宋庆龄写道，“中国认识到她大量需要受过现代教育的男女人才，所以每年都送大批的男女青年出国，去西方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思想。”虽然“数百年来，中国的政治一直以任人唯亲和弄虚作假为特征”，但是随着留学生充任官职，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事实上，通过受过外国教育的那些官员的言传身教，统治者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道德标准已有了很大改进。正是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一个国民议会已经形成，摄政者已颁布一项法令：中国将于1917年成立议会。”而在教育方面，“从西方大学回国的留学生有能力用自己的语言对中国人表达西方的思想，所以，他们受到热情

的欢迎。”这些留学生不仅将智体并重的思想传入了中国的学校,还使中国青年“对辩论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在社会的变革方面，这些留学生的作用“过去和现在都是巨大的”。最后宋庆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为这些留学生提供了广泛的工作领域和无限的机会，他们已证明自己能胜任摆在他们前面的任务，有能力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4]

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首先，此时宋庆龄眼中的现代化是和向西方学习、接受西方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受的西式教育使她十分认同对西方的体制和方式。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宋庆龄对中国的落后感到愤慨，但她却坚信中国的进步和“当今中国问题的解决”依靠中国人的才智和努力是可以完成的，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这既不同于中体西用的折衷主义——宋庆龄从来不会对实际代表着封建意识形态的“中体”抱有任何希望，也不是“全盘西化”论——宋庆龄一直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她坚信“中国人能够有效地、明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完善和繁荣”。[5]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的胜利传到了大洋彼岸，宋庆龄欢欣异常，封建王朝的覆灭意味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变得豁然开朗。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宋庆龄特别提到了使得中国人“区别于文明世界其它国家的最显著标志”——辫子。在宋庆龄看来，作为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辫子的剪除有着极大的意义，剪辫运动正象征着一切保守落后的东西都将随着革命的剪刀纷纷落下。虽然中国无数的改革还在进行当中，但宋庆龄却非常超前的认为，既然“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已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的中国还应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努力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在当时的宋庆龄看来，这就是将“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博爱带给世界。[6]

虽然在美国求学时期的宋庆龄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化这一概念，但从她所发表的文章来看，此时的宋庆龄已经热切地期盼着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通过改良还是革命的方式。

宋庆龄现代化思想的真正形成离不开孙中山的影响。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在思想文化和观念上，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而他们之间“最坚强和永不凋败的感情基础”正是他们共同的理想：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7]孙中山是带领中国现代化起步的伟大先行者，他提出了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伟大纲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正是对应于当时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工业化这三大当务课题，形成了一个当时中国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可资操作的现代化方案。而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探索中形成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一起又构建了一个可称之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体系，虽然并不完善，但却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国家的要素，孙中山本人也为此目标的实现而付出了毕生精力。陪伴孙中山走过的十年革命道路，使得宋庆龄对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大学时期，宋庆龄把教育视作实现现代化的动力，但“同孙中山一起以及她后来独立进行的斗争生活深刻地教育了她”，使她认识到“中国如不进行民族和社会革命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革命取得了胜利，“现代化才能实心实意地去进行——不是模仿西方社会而是建设一个可与西方社会匹敌并最终超越它的新社会”。[8]

正如上文所引，孙中山逝世后，以独立姿态踏上政治舞台的宋庆龄在 1927 年

第一次正式阐述了自己对现代化的理解。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看来实属超前，殊不知，这其实正是孙中山和宋庆龄长期以来所身体力行的。

宋庆龄关于现代化的另一次重要论述来自于她在 1937 年 4 月发表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其实关于宋庆龄的这篇长文，学界已有很多分析、解读的论文，但这些研究大多着重于讨论宋庆龄对儒教的批判，而笔者认为，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宋庆龄的这篇文章中应该还有着一层意思，即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讨论。

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这场所谓“重整道德、改造社会风气”的运动，在全国持续了十五年，直到蒋介石政权崩溃才告一段落。与大陆对该运动的千篇一律的负面评价不同，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与展开，与中国的现代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它是要求国民走入现代化合理生活的开端。其实，蒋介石也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强调：“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目的在求中国之现代化。”但从这场运动的实施来看，它又是带着“儒教气味”的。它所强调的礼义廉耻来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体系，无论是“循规蹈矩谓之礼，舍己济人谓之义，洁己奉公谓之廉，深恶痛绝谓之耻”，还是“礼以扼乱，义以止暴，廉以弥贪，耻以防滥”，蒋介石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始终透着浓浓的封建腐儒之味，正因为这一点，宋庆龄对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那么，为什么蒋介石会认为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是一场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运动呢？蒋介石对现代中国又是怎样一种构想呢？

1935 年 2 月 19 日，蒋介石在《为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国人》一文中写道：“中正于国难期间，在南昌督剿赤匪，鉴于国内人心陷溺，民气消沉，四维不张，国势危弱，内未能共靖赤祸，外未能共渝国耻，爰本革命必先革心之义，倡新生活运动，欲以最简易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人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振迷茫之人心，复民族之朝气。”[9] 在蒋介石看来，“革命必先革心”，现代的中国首先需要国人涤除那些“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其实这样的思想正是与 19 世纪末以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一脉相承的，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民说”，还是章太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评，再到孙中山的“心理建设”，都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对国民性的改造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但是关于如何改造国民性，他们却做出不同选择，梁启超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章太炎呼唤“人的解放”；孙中山则将国民心理的改造与社会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而在蒋介石看来，对国民性的改造将通过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终要求的新生活运动来完成。虽然蒋介石认为这样一个作为社会建设的新生活运动有着“极大的深意”，虽然新生活运动对国民生活的改造看起来是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蒋介石错误的认为要“启导民众走入思想的正轨”，应该在“旧道德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范围以内竭力实行”。[10] 宋庆龄敏锐地发现，这样的新生活运动本质上是保守的，而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她写道：“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正在急剧地变化、改造以及重建。新的社会秩序自然需要新的意识、新的道德标准和新的关系。”但是，“在现代仍然有中国知识分子热心提倡儒教的复活，真是奇怪！要历史倒退回去的各种努力不但没有效果，而且阻碍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以儒教为理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其实“找不到任何新东西”，它也

“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恢复不合时代的儒教，对于我们极为重要的是把农村经济与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加以肃清。”我们要做的是“清洗中国人的头脑，把它从那个阻碍我们文化发展的儒家思想的蛛网中解放出来。”[11]

在完成了对儒教思想的批判之后，宋庆龄提出，现代中国需要的是“另一种思想意识”，“人民生活中经济及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情况，都需要新的思想意识”，而这个新的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文章的最后，宋庆龄对现代中国有着自己的描述，它包括“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创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还包括向“欧洲、美洲、特别是苏联的工业与农业的成就学习”，通过“改善和提高农业生产中的近代技术”来“改善群众的生活”，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类和群众的物质享受”；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击退所有外来的侵略”，“停止一切内争”，并且“收复失地”。在这里，宋庆龄完整地呈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张，而这也正是她在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发生了另一次飞跃。与之前很少直接提到“现代化”不同，这一时期的宋庆龄开始大量地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仅从《宋庆龄选集》和《宋庆龄书信集》来看，宋庆龄在建国后曾三十余次提到“现代化”或是“四个现代化”。这一时期宋庆龄对现代化的认识，既是她自己的现代化思想的延续，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四个现代化”提法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述，早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宋庆龄就对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做出了自己的描述，在1939年12月，宋庆龄又在《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中，对工业现代化作出了相关阐释。建国后，宋庆龄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正式提出“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2]。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7年4月，宋庆龄在《怀念周恩来总理》一文中回顾周恩来的这个提法：“在本世纪末发展成一个拥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3]此后，宋庆龄也开始大量使用“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

纵观宋庆龄建国后对现代化的论述，我们发现，此时的宋庆龄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思路，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举措，例如：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14]、农业的现代化应通过“新的技术和新的组织”来实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15]、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16]、现代化建设既包括“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包括“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7]……关于这些问题，之前已有学者进行了精辟的阐述[18]，本文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在这里，笔者只想补充两点，第一，虽然宋庆龄在建国后才正式提出了她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但其实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在建国前后是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的，我们不应该将其割裂开来。事实上，正如宋庆龄自己所说，1949年之前，在“国内军阀的腐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外夹攻”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根本无从展开，所以在那时，现代化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而在建国之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最大障碍终被扫除，此时的现代化就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来完成。从“革命”到“建设”，这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化的不同侧重，宋庆龄准确地抓住了这些不同的侧重，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她的选择的正确性也

早已为历史所证明。

与之相关的第二问题是，虽然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和飞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庆龄在强调某些方面的现代化时，就放弃了对其它方面的现代化的追求，换句话说，这并不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举例来说，建国后，宋庆龄在大多数时候是用“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来表述她的现代化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放弃了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追求。因为在此时，三民主义的追求事实上与“四个现代化”的追求是一致的。正如宋庆龄在《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使我国在各方面实现现代化”，其实正是在继续孙中山一生致力的革命事业[19]。再比如宋庆龄在1979年2月25日致杨孟东的信中写道：“民主和法制开始占上风并显示出来，……但我们仍不能、也不去把干部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高考录取的新生不能自己选择学校……没有个人的选择，没有个人的自由！……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20]在宋庆龄看来，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化是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完全抹杀了个人的选择，那么，“现代化”便无从谈起。我们更不要忘记，早在68年前的那篇《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中，宋庆龄就对官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现代化的追求一直延续到了宋庆龄的晚年。

结语

从20世纪的下半叶开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反思和修正的阶段，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再局限于“西方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这样一些单一的概念，而是渐渐演变为了一种多元的概念，它的内涵也不断丰富。人们发现，现代化其实从来不是一种可以量化的指标，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程，意味着不断进步和对过去的不断超越[21]，那么，如果以这样的视角去审视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在1963年的6月，宋庆龄发表了一篇名为《缔造未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宋庆龄将新中国的儿童工作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她指出：儿童工作就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其实就像“现代”一样，“未来”也是一个与线性时间相关的概念，如果说“现代”是在与“过去”的分离和对立中确立自身，那么，“未来”则是通过对“现代”的超越来确立的。正如宋庆龄所说，“老一辈人”在他们那个时代为争取社会进步而进行斗争，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则是在“新的条件下把这场斗争继续进行下去”。[22]宋庆龄曾多次在写给孩子们的文章中鼓励他们长大后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23]，她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会在近期实现，而是一次“新的长征”[24]，需要“几代人的努力”[25]，在当前的历史阶段，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是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取得平等的地位”[26]，但这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在下一代的面前，摆着“无限广阔的道路”，有着“无数光荣的任务”[27]等待他们完成——这其中就包括“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消灭剥削、压迫和战争”[28]。所以，宋庆龄的“缔造未来”并不仅仅是指把儿童哺育成人，而是将儿童的培养视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得以延续的保证，即为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缔造未来”其实也是宋庆龄的现代化思想的体现，同时，它也是宋庆龄现代化思想的超前性的再一次体现。

虽然宋庆龄毕生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但我们却很少看到她对自己心目中的现代化图景的描述，所幸的是，在1949年建国的前夜，宋庆龄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从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宋庆龄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也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将继续努力，直到自由遍地开花，文化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每座茅屋改建成体面的房子，那时大地的产物将能普遍享用，工厂将按劳付酬，人民从出生到死亡都有免费的医疗照顾，每个人不论肤色、信仰和居住的地域，都能平等取得各种必需品。在上述目标尚未实现之时，我们将奋斗不息。”[29]

——宋庆龄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2] 张艳华：《30年代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长白学刊》，2003.1。
[3]《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4]《中外杂志》，1995.2。
[5]《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6]《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7][8]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页至第56页，第642页。
[9]《新生活》第2卷，第2、3期合刊。
[10]《公报》第349期，1935年8月25日，转引自吴伟俊《韩复榘》一书。
[11]《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至第179页。
[12][13]《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6页，第534页。
[14]《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15]《第一个五年》，《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16]《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61页。
[17]《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6页。
[18] 见刘国友、傅绍昌：《宋庆龄现代化思想初探》，《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6；吴传煌：《宋庆龄的中国现代化思想刍论》，《甘肃社会科学》，1996.2。
[19]《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4页。
[20]《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3页。
[21]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2][23][24][25][26][27][28]《宋庆龄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3页，第629页，第593页，第628页，第593页，第196页，第403页。
[29]《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宋庆龄与爱国华侨蔡福就

撰文 / 郑培燕

宋庆龄一生团结了无数国际国内的进步人士，与很多人的友谊保持了数十年。在这些友人中，有一位爱国华侨名叫蔡福就，在海外特别是在华侨中有很高的声望，而在国内，了解的人却并不多，他与宋庆龄的友谊，就更加鲜为人知了。蔡福就能够与宋庆龄结识，并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与他丰富而传奇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一门忠烈的廖家有着直接的关系。

普通华侨子弟
成长起来的优秀共产党员

蔡福就原名蔡祖复，又名蔡苻洲，广东省中山市隆都永厚乡人。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时代，使得他幼年和青年时期的思想意识和感情都打下了反外侮、反封建、反军阀、反独裁的烙印。中学时期蔡福就积极走进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在日本明治大学留学期间，蔡福就已经在留学生中崭露头角。幼年及青年时期爱国情感的积淀，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引领着蔡福就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的胞弟蔡沧溟。蔡沧溟原名蔡祖杰，早年移居美国，改名蔡沧溟。蔡沧溟在美国旧金山接触到美国和华侨中的进步人士，在旧金山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在美国



▲ 蔡福就在美国旧金山（1941 年）

西部地区的负责人。1937 年，蔡沧溟受中共派遣来香港工作，担任中共香港工委委员。卢沟桥事变后，蔡福就比蔡沧溟稍晚一些回到祖国，与家人移居香港。在香港，他了解到弟弟蔡沧溟所从事的是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事业，因而，他不仅支持弟弟的工作，也向弟弟提出了介绍他入党的要求。1937 年经香港工委批准，蔡福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和入党监

誓人便是蔡沧溟。从此，蔡福就踏上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征途。

加入党组织以后，蔡福就在党内的直接领导人是廖承志，当时是中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国共重新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便是1938年1月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公开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其宗旨是为新四军、八路军募集抗战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参军参战，团结海外各界爱国人士。廖承志是蔡沧溟的直接领导人，自然也成为蔡福就在香港开展工作的直接领导。廖承志经常到蔡家与蔡氏兄弟讨论工作，蔡氏兄弟也经常去廖家。在廖家，蔡福就不仅认识了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姐姐廖梦醒，姐夫李少石，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廖承志称蔡福就为“大蔡”，廖梦醒夫妇称他为“阿洲”，因为那时他还是用的本名蔡荇洲。他称廖梦醒为“醒姐”。1940年4月下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派蔡福就与胞弟蔡沧溟前往美国，担当隐蔽工作，组建太平洋交通网。在廖承志直接领导下，蔡福就开创太平洋交通线，沟通了敌人包围中的中共抗日根据地与外部的联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开始征兵。蔡福就被美军征召入伍。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精通日语，入伍后蔡福就先后被派到印度新德里为盟军合作服务，配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北部打击日本侵略者，后在昆明、重庆和上海的对日情报部门工作。在重庆期间，蔡福就与中共驻渝办事处接上了关系，也与他的亲密战友、时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长的李少石重逢。那时李少石与廖梦醒住在上清寺牛角陀，廖梦醒协助宋庆龄在重庆进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也正是因为与廖梦醒的重逢，蔡福就才得以结识宋庆龄，并与她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经廖梦醒引荐，开始与宋庆龄的友谊

早在香港时，蔡福就已久闻宋庆龄大名。蔡福就的弟媳妇即蔡沧溟的妻子伊娃在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而宋庆龄也是在多年前已知道蔡福就，当时在保盟工作的廖梦醒，经常在宋庆龄面前提到蔡福就，所以宋庆龄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也知道他是受廖承志的委派去美国的。可惜蔡福就一直无缘与宋庆龄见面。

1945年8月，蔡福就在重庆与廖梦醒、李少石夫妇重逢后，廖梦醒将他在重庆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非常高兴，就让廖梦醒转告蔡福就到宋公馆来。在两路口新村的宋庆龄公馆，蔡福就与同事李国威受到了宋庆龄的热情接见。这一次会面，蔡福就永生难忘。宋庆龄热情地留蔡福就和李国威吃晚饭，并邀请他们有空就来坐坐，也可以结识各方面的人士。席间，宋庆龄问及蔡福就的太太和女儿，得知香港沦陷后，她们回到中山，蔡福就多年都未能与她们取得联系，也未能寄钱给她们，就对蔡福就说有可靠的办法帮蔡福就把钱带给她们。因为弟弟宋子良即将前往广东就任财政厅长，可以让宋子良将钱带到广州，再派人送到蔡福就太太家中。蔡福就当即写下了太太的详细地址和名字，连同一千美元交给了宋庆龄。不久，蔡福就的太太就收到了广东省银行送来的一千美元。蔡福就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就受到她如此关心和帮助，内心充满感激，对宋庆龄更加尊重。此后，蔡福就和李国威就经常到宋庆龄公馆，成了宋庆龄的常客。

蔡福就在重庆期间，正值抗战胜利，国共两党最高级会谈，中国政要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到重庆，李少石提议蔡福就请名人政要题字，以做纪念。此后，李少石为蔡福就准备了两本题字贴，一本由他出面

请毛泽东、周恩来题字，另一本由蔡福就请宋庆龄题字，再通过宋庆龄请各方人士题字。一切准备就绪，蔡福就于1945年9月1日晚上与李国威一起来到宋庆龄公馆。那天晚上，宋庆龄非常高兴，刚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毛泽东也出席了这次酒会，那是他第一次在重庆公开露面。宋庆龄兴致勃勃地向蔡福就和李国威介绍了酒会的情况。得知蔡福就请她题字的来意后，宋庆龄欣然应允。在宋庆龄的帮助和他自己的努力下，蔡福就得到了众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于右任、史良、茅盾、冯玉祥等的题词和赠画。这本名人题字的帖子，蔡福就一直珍藏着，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也是他与宋庆龄友谊的见证。

宋庆龄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有着很高的警惕性，而她的这份警惕性和对友人的关怀，曾经保护了蔡福就。那是1945年10月8日，蔡福就的亲密战友李少石被国民党士兵枪击致重伤，经抢救无效身亡。宋庆龄知道蔡福就挂念廖梦醒，极有可能前去看望。鉴于蔡福就地下党的身份，宋庆龄深知，如果蔡福就贸然去看望廖梦醒，极有可能暴露身份，成为特务的目标。于是宋庆龄第二天即派工作人员到蔡福就工作的美军司令部，送去一张便条，提醒蔡福就不要去廖梦醒处，因为附近特务很多，有事可以到她家去。宋庆龄的提醒让蔡福就从悲愤中清醒，当晚就去了宋庆龄家。宋庆龄得知他没有贸然去廖梦醒家后才放心，并一再嘱托蔡福就不要再去廖梦醒处，注意保护自己，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第二天，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蔡福就去看望了廖梦醒，之后，由周恩来的车护送离开。[1] 宋庆龄对蔡福就的关心和提醒，蔡福就万分感激，也永远铭记在心。

抗战胜利后，蔡福就所在的驻华美军司令部于1945年底迁往上海。1946年8月21日，蔡福就收到了廖承志的信，嘱咐他以社交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因此，他常常带着女儿到廖梦醒家与潘汉年接头，与廖梦醒一家去许广平家串门会友，去周尔复、乔冠华等文化名人家里做客。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将保卫中国同盟从重庆迁到了上海，继续开展工作。自然，这一时期，蔡福就也时常带着同事李国威去探望宋庆龄。

1946年9月底，蔡福就复员，举家回到旧金山。回到旧金山后他重建太平洋交通网，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特殊通道。同时，蔡福就还协助冯玉祥组建“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支持国内民主运动。1949年5月4日，蔡福就与弟弟蔡沧溟创办了进步报纸《金门侨报》，这是当时旧金山唯一一份进步报纸，颇具影响。此外，根据周恩来加强留学生工作的指示，蔡福就在留学生中加快党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解放。1949年6月3日，宋庆龄就收到了蔡福就从旧金山发来的电报，译文内容如下：“孙夫人，很久未能写信给您，非常挂念。很高兴上海解放后立刻有机会发电报给您。不知醒姐是否已回到上海。我们都很好。此致　福就于旧金山。”[2] 由此可见蔡福就对宋庆龄的挂念之情。


RADIOGRAM

WORLD WIDE WIRELESS

交通部國際電台

CHINESE GOVERNMENT RADIO ADMINISTRATION

UC185 SANFRANCISCOCALIF VIA GLOBE 35 JUN 2 515P

DLT MADAME SUN YET SEND

SHANGHAI/CHINA

IMPOSSIBLE WRITE YOU LONG WHILE MISSING YOU MUCH GLAD

HAVING EARLIEST CHANCE CABLE YOU AFTER SHANGHAI LIBERATION

IS CYNTHIA BACK SHANGHAI WE FINE REGARDS PO BOX 1263

SANFRANCISCO

JOECHZOY

1445/3/TL DZG32

▲ 宋庆龄1949年6月3日致蔡福就电报

从幕后走到台前，延续与宋庆龄的友谊

1952 年初，蔡福就回到祖国，依然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从事与华侨有关的工作。奉命到香港工作以后，他将原来蔡荇洲的名字改为蔡福就，正式取得香港身份，从此结束隐蔽工作，从幕后走向台前。

1954 年，蔡福就接到廖承志指示，接收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为归国探亲观光的华侨提供服务，以此团结更多的华侨支持新中国的建设。此后四十多年间，蔡福就利用香港特殊的地位和条件，为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服务，巧妙完成党组织交办的重大任务。他从不看重个人的名利地位，始终做到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为了香港中国旅行社的发展，蔡福就付出了半生的全部心血，让香港中旅社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在香港地区指定的唯一代办“港澳同胞回乡证”和“台湾同胞回乡证”的企业机构。

而在担任香港中旅社副总的这些年中，蔡福就与宋庆龄的友谊也未曾中断过。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要有时间，宋庆龄也有空，他都会约同廖梦醒一起去看望宋庆龄。他还经常为宋庆龄送来一些国内比较稀少的物品，如缓解关节疼痛的红花油、治疗皮肤瘙痒的“无比膏”，办公用的圆珠笔、墨水笔。宋庆龄也经常在信中表示感谢，曾以蒙古刀、土特产、瓜果等物品相赠。蔡福就赠送给宋庆龄的一把“丛林刀”，宋庆龄也一直保留着。此外，宋庆龄如有朋友从境外带东西过来，或者有东西要带给境外的朋友，常常都是通过蔡福就帮忙。宋庆龄在 1971 年给秘书杜述周的信中称蔡福就为“老战友”。在宋庆龄生命的最后十年与好友邓文钊之子邓广殷先生的往来书信中，宋庆龄也多次提到老朋友蔡福就。

宋庆龄与蔡福就以及蔡福就的弟媳妇伊娃也有书信往来。就蔡福就的弟弟蔡沧溟在美国被人蓄意制造车祸遇害一事，宋庆龄特别在信中表示了慰问和对蔡沧溟妻子伊娃的关心：“令弟被美帝特务所害真是令人发指。这笔血债，让我们记了下来，将来总有一天要清算的。你为令弟的被害，必然又悲又痛，尚望你节哀，保重身体。伊娃重伤后，已逐渐复原，这是令人庆幸的。但她重伤后受此打击，不免要痛定思痛，请为我安慰她，要她多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不要过分悲伤，把悲与愤化为力量，振作起来，继续生活下去。”[3]

1971 年香港中旅社建造新大楼，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题写招牌，蔡福就想到了宋庆龄。1972 年 4 月，他前往北京请宋庆龄题写社名招牌。宋庆龄因自幼留学美国，中文毛笔字写得不好，就提出请郭沫若代为题写，并允诺万一郭沫若不写，她就自己写。第二天，在廖梦醒的陪同下，蔡福就前往郭沫若的家中。郭沫若欣然写下“中国旅行社”五个大字，这就是现在香港中国旅行社招牌上的题字。而让蔡福就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一年后，蔡福就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她写的“中国旅行社”手书。虽然没有用上，但是可以看出宋庆龄对这件事的重视，她对香港中国旅行社的亲切关怀给蔡福就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1] 郑奕钧：《传奇人生——记蔡福就走过的路》，海峰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30 页至第 136 页。
[2] 蔡福就 1949 年 6 月 3 日致宋庆龄电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
[3] 宋庆龄 1963 年 2 月 28 日致蔡福就信，《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 628-6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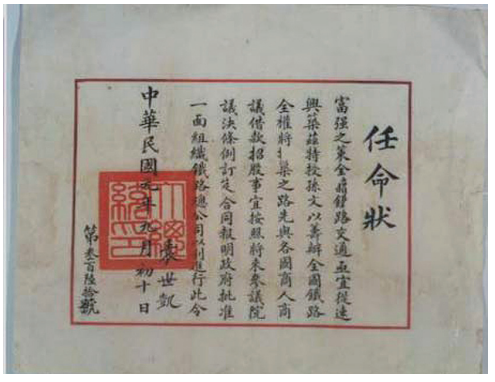
中山先生一件小事

撰文 / 倪旅泉

唐人（严庆澍）先生所著《北洋军阀演义》曾提及一段民国时期的公案：民国元年（公元 1912 年），袁世凯曾任命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负责监修全国铁路。孙亦许愿，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 20 万公里（一说 10 万英里）。然而一段时间后袁世凯清查铁路公司帐目，发现尽管公帑耗去百万，铁路却一寸未建。袁遂指责孙“挥霍公款”，甚至下令全国通缉。

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一个是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的奸雄，控辩双方的身份使得这桩官司看起来真相已明，袁世凯无非是捏造罪名诋毁中山先生，试问一个能把地痞流氓组织成请愿团向国会施压的政治无赖又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的呢？

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袁世凯任命孙中山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是 1912 年 10 月的事情。6 个多月前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中山结束了将近 3 个月的临时总统任期。应该说从袁就任总统到 1913 年宋教仁被刺期间，袁孙二人基本处于关系蜜月期。根据“台北党史会”所编《国父年谱》，孙中山于 1912 年 8 月底赴京与袁世凯会面，“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



▲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任命状

正是在这期间，孙中山主动向袁世凯提出，“愿专任修路之责，将全国铁路延长至 20 万里（一说 10 万英里）”。对于孙中山主动请缨的动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显示不与争权的姿态，“以安袁氏之心”。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孙中山本人理想主义性格在此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孙曾游历世界，深刻体会发达的交通设施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早在 1894 年他以《上李鸿章书》向李进言时就提到应“货畅其流”，20 年后旧事重提既是政治上的韬晦之计，也是希望多年夙愿能够成真。



▲ 孙中山规划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干线图》

但 20 万里铁路是什么概念？不久前国家铁道部才提出，希望到 2020 年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能够达到 12 万公里。2020 年中国的铁路营业里程才可能达到 12 万公里，100 多年前的中山先生就想修 20 万里铁路？！袁世凯于是顺水推舟，答应孙的请求，并委任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授以筹建全国铁路特权。袁还将慈禧时所用花车特拨孙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做盛大招待。”

凭袁世凯的从政经验，他应深知凭借当时的生产条件无论如何不可能修建 20 万里铁路，然而袁不仅满口应承，还对孙极尽笼络。袁的算盘很缜密，从眼前利益而言，投孙中山所好使其有事可干，最好能深陷其中，如此不会对袁掌控全国局面形成掣肘。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而言，20 万里铁路无疑是天方夜谭，可你孙文拍胸脯保证，关键时刻此事将成一张制造舆论、挤垮政敌的妙牌。果然，不久以后，袁孙交恶。袁世凯开始清查中国铁路公司帐目，“发现”公帑已耗去百万，可铁路一寸尚未开建。于是就有了袁世凯指责孙中山“挥霍公款”，展开全国通缉之说。

所谓“挥霍公款”案是袁孙两人政治手腕的一次较量。中山先生的出发点可称至诚，无论是“以安袁心”的政治考量，还是修建铁路的个人抱负无不出自对未来中国局势的考虑。而袁世凯则有手段而无理想，答应孙中山修铁路是希望安置、进而捆住政敌，昔日周瑜要陷刘备于“温柔乡”，袁氏此举无非是弄个“理想乡”，和周郎美人计殊途同归。更要命的是，袁氏从一开始就已经为与孙中山反目做好预案，特拨慈禧所用花车，还饬令各地官员盛大迎接，这些无疑是有预谋的为孙中山“挥霍公款”做好铺垫。

袁世凯此人一代枭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在其回忆录中称其为“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言不无道理。“挥霍公款”一案足见他缜密高超的政治手腕，易时而处，未必不是又一个曹操，他所欠缺的是对历史方向的认识和把握，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很难过于苛责他。当然无法认清历史方向是大节，大节不保而遭人唾弃也情有可原。

中山先生事事以国是为先，高风亮节让人钦佩。只是一腔热忱之外，彼时的孙中山从政行事显然不够老练，和袁世凯从地方道员、督抚直至中枢军机大臣所历练出的政治手腕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孙中山性格也过于理想化和冲动。章炳麟曾评价中山先生“论功不如黄兴、论才不如宋教仁、论德不如汪精卫”，此言固然有光复会和同盟会矛盾的原因，但也不能不说是完全没有道理。

如上所述无意做所谓翻案之类的事情，鲁迅先生曾说过，有伤口的战士始终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始终只是苍蝇。只是历史并不是样板戏，其中人物，当我们揭开在其脸上挂了多时的脸谱，细咂个中滋味，有时还是能品出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历史有高潮、也有低谷，有奇丽、亦不乏琐碎，生旦净丑、七情六欲、犄角旮旯，无所不容。这是历史的真相，也是历史的真谛。

（作者系《解放日报》编辑）

故居的人与事

撰文 / 陆柳莺等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九届市委十六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引领机关后勤广大干部职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积极营造爱岗敬业、勤奋工作、诚信服务、行为文明的和谐氛围，促进各单位文化建设，局工会在局系统开展“百名感人事”的征集活动。本次征文在故居共征得六篇，现全部刊出，以飨读者。

故居的脊梁

二十五、六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战士脱下军装，先后来到位于淮海中路1843号这所宁静而优雅的院落——上海宋庆龄故居，开始了他们职业生涯的陌生的新篇章。

没人告诉过他们“文物”是什么？有何用？应该如何来保护与利用？但他们心中很明白：保护好这些伟人留下的遗物就是自己今后的工作。不懂文物保护技术，他们就在相关人员的指导下试着擦拭保洁；学着将文物一件件地登记存放；找来资料查询了解与这些文物相关的历史，并尝试着将它们整理编写成讲解内容，向前来瞻仰参观的观众宣传。在故居初次大修期间，他们曾骑着黄鱼车帮着搬运维修材料；为了故居庭院的整洁，他们学着修剪枝叶、清扫落叶；整理档案、值夜守门，只要是工作需要，在哪都是岗位。他们为这份平凡而又神圣的职业，奉献着自己青春和智慧。

随着文博事业的发展，一批批高学历的青年相继加入了文博的行列，伴随着纪念馆职能的拓展与高新技术的应用，纪念馆的文物保护、展示宣传与专业研究功能不断提升，这批老兵们原有的知识技能显现出明显的缺陷，为了纪念馆事业更好地发展，他们陆续从一线管理岗位转向其他的岗位，有些工资待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为了纪念馆事业的发展，泰然面对这些个人的得失，并在后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对职业的理解，传授给年轻的同志。

如今虽然他们都已头发花白，腰杆也不再挺拔，但他们仍是故居的脊梁，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执着的奉献，换来了故居风貌的依旧如故与纪念馆工作的生机勃发。二十多年来，他们视故居为自己的“家”，对故居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对纪念馆的每一项成绩都发自内心地欢欣。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敬业精神和高风亮节，赢得了后来者的敬重。

（陆柳莺）

为故居添彩　为和谐增辉

工会工作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她是我们员工自己的组织，也是单位不可或缺的港湾，它作用发挥得越大，显示的员工幸福指数就会上升。

自己作为一名老工会干部，深深体会到工会工作的深浅与工会干部的职权和能力是成正比的。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和了解，我觉得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会工作充满活力，搞得有声有色，我们坚持了为职工服务的传统，维护职工的基本权益，比如季节变换时及时关心职工，组织职工健康体检、开办健康讲座、生病探望慰问等人性化服务。此外，工会还结合单位实际，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在活动中增加职工接触和沟通的机会，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凝聚力。比如组织职工外出学习交流、参观，参与社区文化共建活动等，尤其是每天早上别具特色的广播操，就像是集合号角，提升了大家的精神面貌。工会工作现在更加规范，组织更加健全，工会工作有计划、有目标，特别注重单位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文精神，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活动安排有模有样，工作形式、内容更为大家所欢迎，工会委员们热心服务、勇于奉献。这些都让我这个老工会工作者感动，这就是工会发展的基础和目标所在。衷心祝愿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会越做越好。

（方国富）

故居志愿者掠影

之一：敬业成就专业，专业成就梦想

在世博会之后，社区志愿者这支队伍继续在我馆兢兢业业地工作着，虽然有些人员上的变动，但这支队伍的精神由骨干队员做了良好的传承，李宁阿姨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她是一位来自静安区愚谷邨居委的普通退休职工，干练的短发、挺拔的身姿，总是让我们惊叹好有精气神的阿姨啊！

李宁阿姨是每周四上午来故居服务的，两年来，她从未请过一次假，从来没有迟到或者早退过。有时，中午来参观的游客并不是很多，我们就想让她早点回家吃中饭，开始时，她总是说：“时间还没到了，来了么就要做做好的呀！”。后来，索性她也不让自己闲着，不让我们有机会让她早走，即使没有游客参观，顺带着帮我们搞搞卫生，看到开放区域有少许的灰尘垃圾就不动声色地处理掉了。

由于我们单位是名人故居，在我们这个服务点提供志愿服务，光有一股子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志愿者面对参观者，需要大量的相关专业知识的储备。每次，当我们在带讲解的时候，李宁阿姨总是很认真地跟在后面听，每次听完还跟我们讨论一两个点的内容，讨论完她总是心满意足地笑笑。李宁阿姨说过，年纪大了，背东西很慢，听你们讲就容易记了，每次记一点记一点，等有游客问的话就不怕了。虽然只是志愿者的岗位，虽然一周只有来半天的时间，但是即使这样，李宁阿姨还是以“专业”来要求自己，来代表故居的形象。

之二：守护内心的光荣

2010 年 5 月，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与上海宋庆龄故居开始合作，上海交通大学宋



▲ 故居工作人员在为志愿者进行培训

庆龄故居志愿服务队就此成立。队员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在读学生，平时学业压力很大，竞争也很激烈，但是，无论是考试前紧张的复习阶段，还是春节前后本该与家人朋友欢聚一堂的节假日期间，每一位队员都会保质保量完成志愿服务，尽自己作为一名志愿者的责任为前提，不缺席、不空岗。

其中，李泽龙、谢鲁威两名队员，连续两年在故居担任志愿者，当其他队员临时有事不能到达的时候，他们会积极主动地补上，牺牲自己本来就不是很充足的休息时间，成为队友可以信赖，广受故居工作人员称赞的志愿者。尤其是李泽龙同学，他本人是一名在校的国防生，平时不仅有繁重的课业，还需要参加训练，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本来就处于高度压力之下，然而，再苦再累，他都会以百倍的精神出现在宋庆龄故居志愿者的岗位上。在队伍中，他不仅仅是一名好队友、好榜样，更是一种让每一位同伴都为之鼓舞的精神力量，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我们这些志愿者，不仅拥有激情与梦想，更明白什么叫做使命，什么叫做责任。

（许毅倢）

令人感动的园林工翟师傅

宋庆龄故居环境优美，绿草成荫，绿树环抱。故居的特色是高大挺拔的香樟，在香樟的映衬下，更彰显了故居主人高贵典雅的气质。

但是谁又会知道，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由一个人来负责的呢？他就是我们馆的园林工翟玉海师傅。翟师傅其貌不扬，身材还比一般人显得瘦小，但是通过他的工作，让我对他印象深刻。

他是个非常勤劳的人，故居庭院绿化近 2000 平方米，一个人负责这么大场地的绿化其实非常不容易。香樟每年 4 月开始落叶，由于故居樟树有 30 棵，落叶时犹如一阵阵叶雨，往往是这里刚扫完，回头一看，又是一地的叶子。很多落叶会静静地堆积在那些密密的草丛里，这些让人容易忽视的地方翟师傅可没有放过。为了让樟树和草坪更好地成长，翟师傅一天天地清理，落叶越来越少，环境也显得更加完美。一个人可以默默无闻把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坚持如此之久，不得不令人佩服。



▲ 故居园林工翟玉海师傅

有一次我路过他的身旁，好奇心驱使让我仔细观察了他好一阵。他像在给树木做按摩一般，用手在树叶当中摸索着什么。走近仔细看，原来他是用手在捉躲在灌木丛叶子中的小青虫，这些虫类似于毛毛虫，但是体态较小，躲在叶子当中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些虫子以叶为被，打药水的时候可以说稳如泰山；平时就啃食叶子，如果不处理，它们会让灌木的叶子失去 50% 以上，严重危害树木的健康。翟师傅就这样一个个给树木做体检，拉出的虫子有的长达 7、8 公分，拖出来之后就用脚踩死。有这样的耐心精心照料着这些小树、花草，我馆的绿化怎么会不好，怎么会不繁茂？它们在回报照顾它们的翟师傅，回报整个故居。

一个人可以很普通，可以不做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是他可以勤勤恳恳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到极致，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经常参照翟师傅，会让我们有所

体会，能够让我们更加珍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回报养育我们的社会。谢谢翟师傅，是他让我在平凡的岗位上感受到了他的执着，让我充满了感动。

（高海涛）

从小事做起……

在故居工作这么多年，一位高高大大的保安师傅总是引起我的注意，他就是保安队长张志成师傅。

故居的纪念品销售，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各类书籍。而搬运这些书籍或者其他重物，却是我们办公室女同志所承受不了的。每当这个时段，你都会看到一个高大的背影，头戴保安帽，身上的制服外套已经褪去，衬衣上也已印满了汗渍。

我知道，这是我们张师傅在帮忙做的一份小事。

保安队伍的人员变化，会影响到我馆保安人员的数量。前阵子，由于保安人员的跟不上，已经连续工作了五天的张师傅，会放弃难得的一天休息，来故居顶岗。每天中午的调换吃饭，也总要替换完全部上岗人员，而每每看见他吃饭时，时间已经指向了下午一点。

这是我们张师傅众多小事中的一件。

四月初上，馆内的香樟树开始大量落叶。而每当此时，无论你是在阳光明媚的好天，还是下着淅沥雨水的雨天，只要你走进故居这所院落，你就会发现馆内的小路总是干干净净。

我知道，这也是我们的保安队长张师傅每天会参与做的一份小事。

最最感人的是每逢大年夜和年初四晚上，身为保安队长的他，在不是他值班的情况下放弃休息，不计得失，晚间亲自到单位，检查安全。除夕夜和财神夜，从来都是举家团聚温情的日子，而我们的张师傅却轻描淡写地认为：这是应该的……。

其实很多小事组合成了平常事，却能将点滴汇流成河。我们没有从他的举手投足间看到任何特别的作为，但那些无声的做法却深深感染了我们，告诉我们一切从小事做起……。

（徐徐）

故居那一抹绿

人们经过上海宋庆龄故居，无一例外都会被门口英姿飒爽的武警战士所吸引，忍不住会停下来看一看这是什么地方。战士们身着绿色制服，笔直地站在绿色的岗亭上，神情严肃，目不斜视。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那一抹绿永远都在。

武警驻守故居是沿袭宋庆龄在世时的传统。这么多年来，武警三支队二中队的战士们换了一批又一批，但驻守宋庆龄故居是他们一直以来都坚守着的岗位。他们是故居的第一道屏障，鉴于他们无形的威慑力，故居的安全无疑得到了最好的保障。

平日里在岗位上的他们是严肃的，甚至有些冷冰冰。但上岗时间外的他们却是最热情的，只要故居有需要，他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来帮忙。

每年春季，故居院子里铺天盖地都是飘落的樟树树叶，他们来了，一鼓作气，将落叶清理干净；夏季，故居里极重的大型地毯需要晾晒，他们又来了，挥汗如雨，来回搬运地毯，还把自己的训练场地腾出来晾晒地毯……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脱下军装，他们只是 20 岁左右的孩子，但他们不怕脏不怕累、尽职尽责、雷厉风行的行事作风却让人动容。即使是身为故居工作人员的我们，有时也忍不住会想，只要有他们在，没什么事是办不到的。

那一抹绿是故居的一道风景，一个屏障，更成为了所有故居人心中的一股精神力量。

（宫洁菁）

“长三角”红色旅游景区人员培训有感

撰文 / 夏义坤

2011 年 5 月 23 日，我有幸参加国家旅游局红色旅游办公室举办的“长三角红色旅游管理人员培训班”。一周的培训过程中，全国红办主任胡呈军为大家介绍了“全国红色旅游发展情况”，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东南大学旅游学系教授、东南大学旅游规划研究所所长喻学才分别为大家作了题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管理与利用”和“红色旅游如何创新”专题讲座，部分省市景区代表在培训班上介绍经验，实地参观了“七战七捷纪念馆”、“角斜红旗民兵团史绩陈列馆”、“溱湖湿地”、“梅兰芳纪念馆”、“泰州凤城河风景区”、“常熟沙家浜风景区”等地。专家授课、实地参观和学员们的讨论，使我获益良多，收获颇丰。

这次培训，让我较系统地了解了全国红色旅游发展情况，学习到了景区建设、管理和利用，红色旅游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提升，红色旅游线路的组织和营销等基本理论与知识。专家们的授课不仅深入浅出、高屋建瓴，更有立足红色旅游的实际，深入研究红色旅游发展规律，拓展红色旅游市场的先进经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培训学习，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明确了红色旅游发展方向；实地参观，对我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旅游的意义和价值。

短短的一周培训，我感到：

1、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越来越突出。“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红色旅游”可以学习革命历史，了解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切身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舍身忘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激发观众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目的。“红色旅游”是我国旅游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红色旅游基地应着力于散客的争取。红色旅游基地依托资源优势，长期以来吸引了大批旅游团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团体参观。但是，随着旅游业的



▲ 七战七捷纪念馆



▲ 七战七捷纪念馆内部陈列



▲ 梅兰芳故居



▲ 沙家浜风景区

发展和旅游服务方式的不断完善，游客越来越多地趋向于自主、自助的方式；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和自由化的旅游。因此，红色旅游基地必须应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把着力点放在争取散客的目标之上，为散客提供更完美、更周到、更贴心的服务。

3、积极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全面提升红色旅游质量。红色旅游是广大观众了解我们党的革命奋斗史的重要窗口，是弘扬民族精神、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红色旅游基地首先要找准定位，不断挖掘基地内涵，丰富基地宣传内容，打造基地特色品牌，形成基地独特卖点，提升基地竞争优势，吸引更多观众；而且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把基地建设纳入本地区旅游发展规划之中，加强优化整合，以美学的眼光对基地进行规划和建设，精心打造基地陈列展览，不断推出新的旅游产品，促进旅游基地的发展，开创优质服务品牌；要精心策划基地营销，不仅要叫卖推广，更要加强合作，开展联营，形成集聚效应。要学会利用市场的力量将红色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开发新市场，培育新消费，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格局。

通过这次短暂的培训，不仅使我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认识，而且更加坚定了我做好本职工作，为我馆红色旅游基地建设贡献自己微薄力量的决心。我相信：红色旅游将会在全国更加红火，魅力长存。

方言在讲解中的运用初探

撰文 / 许毅倢

在推广普通话的号召中，全民的普通话日趋标准，全国人民语言交流的障碍已基本不复存在。然而在“推普”的大潮中，方言的保护与运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座丰沛的文化宝库，一旦这种语言不再被运用被传承，这座文化宝库的也将随之消失，而且这种消失是一种不可逆的进程。任何方言所承载的是大量当地的文化与习俗，方言的失传意味着本土文化的遗失，与其在若干年后挖空心思、事倍功半地去打捞那些尘封的记忆，倒不如趁着为时未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保卫本土文化做出些许努力。

我馆讲解中所涉及的方言种类

1、上海话（川沙方言）

宋庆龄是上海的女儿，从她的身上读到的那一份美丽、那一份执著、那一份洋气、那一份不畏权势的清高，正是浦江的水所孕育的“海派”气质，而她也成为海派文化的传奇代言。如此一来，触摸着这位伟人点点滴滴的我们，又怎能离开“海派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而这块土壤之所以肥沃，那迷人的吴侬软语的灌溉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而从宋庆龄的音频资料来看，宋庆龄所说的上海话，还更多的带有川沙口音，所以川沙方言，也在此顺带一提。

2、广东话

提到宋庆龄，不得不涉及到孙中山，而孙中山就是广东人。孙中山名字的英文翻译就是按照“孙逸仙”广东话的读音来拼的“Sun Yat-sen”。甚至坊间传闻，因为孙中山是广东人，当时差一点粤语就成了推行全国的国语。在实际的接待过程当中，来自广东、香港的客人也占了相当的比例，尤其是香港的客人，虽然他们的普通话水平较几年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基本都可以听懂，但是表达上还是比较吃力，导致他们与我们的交流仍然存在着障碍。若能学会些许的广东话，就能够解决这一障碍，至少达到“会听毋会讲”的程度，也可解决相当部分的问题。

3、闽南话

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现多为华人第三代，他们的祖辈很大一部分都是从福建去到南洋谋生的，而且很多人都是曾经资助过孙中山先生的华侨，他们对于孙先生

的信仰波及子嗣，这也是这部分游客步入故居的源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同胞们也并不是全部都会说闽南话，国语是通行的语言，但是国语和普通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小则一些词汇的区别，比如普通话的“地铁”，国语叫“捷运”；大到一些名词叫法和解释的不同，比如历史课本上的“解放战争”，在台湾同胞或是海外的观点则称为“中国内战”，这种差别更多的是基于立场的不同，已然是题外话了。但这“国语”与“普通话”的区别应该被我们所认识，在接待过程当中也许要被重视。

综上所述，这三种方言，无论是基于陈列展览的延伸，或是交流沟通的需要，亦或是情感的寄托，或多或少地穿插在了日常的讲解接待当中。如若方言能够融入到讲解当中，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下，笔者将从陈展方角度、游客角度以及社会影响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方言在讲解中运用的可行性，也对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操作中的问题提出了可预见性的假想。

方言讲解的面面观

1、陈展方角度

一直以来，对于讲解的定义，无外乎是一种媒介，用语音的形式将展览所要表达的内容传达给参观者，讲解从来只是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但有的时候，笔者时常思考，其实讲解也可以成为展览的一部分，属于非物质的展示内容。

结合我馆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文物馆里的那一段宋庆龄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的发言，常常引得参观者驻足聆听，无论是不是上海人，无论是不是能听懂，都想听一听这伟人的声音；而听完之后，议论的都是她的那口上海话。既然观众有兴趣，那我们也可以适当增加这方面的内容，不仅听宋庆龄讲，也听讲解员讲，使得整个参观过程浸润在一种浓浓的上海味道之中，更多维地感受宋庆龄的气息。于陈展方，这样的效果也可作是意外的惊喜了。

除了上海话之外，上文提及的广东话和闽南话，则更多的是方便了讲广东话和闽南话的游客理解展示的内容。相信这也是陈展方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2、游客的角度

游客前来我馆参观展览，大多目的有二：一是理解展览内容；二是感受伟人气息。为达成理解的目的，在讲解当中运用游客更为熟悉的方言作为载体，相信这一份亲切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讲解当中用宋庆龄所运用的语言来发声，这也将迅速拉近游客和伟人之间的距离。无论是基于参观的目的亦或是为激发参观者的兴趣，方言的运用都将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3、社会影响角度

在本文的引语部分就已经提及了时下“保卫方言”的风潮，方言在大众传媒及公众领域的运用越来越被重视。现在曾经主要针对农村的沪语广播电视节目逐步时尚化，各地方言版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公共交通线路也加入方言报站，上海航空公司甚至新近推出了沪语欢迎词，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示着方言的强势回归。

从保护方言、保护地方文化的角度来看，作为公众文化场所，虽其影响不能够与大众传媒比拟，但尽己之力去传扬，也是我们的责任。

从舆论导向来看，若我馆能够搭上这波“方言回归”的潮流，相信我馆亦能引起社会热议，从而扩大我馆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当然，这种热点的营造，免不了被冠以“哗众取宠”的名号，所以，介乎于“传扬”与“炒作”之间的分寸需拿捏得当。

以上，是笔者从理论角度来肯定方言

于我馆讲解当中运用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取得了理论的基础之后，对于具体的操作，笔者亦有些许的陋见，不足之处，望诸公指正。

方言讲解的可操作性

1、人工讲解

人工讲解相比于电子导览，更为灵活，可以根据游客的反映对于讲解的内容、形式作出及时调整。故在此种模式的讲解过程中，可以灵活地调整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比重。

（1）方言＞普通话

这主要是基于受众能够听懂并理解此种方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操作背景是受众比讲解员对于此种方言的认知程度要高，讲解员可运用少量的普通话来解释个别的词组或句子。以此营造出一种“以客为主”的熟悉、亲切的参观讲解氛围。

但是，如此形式对于讲解员方言掌握的水平要求比较高，不但要会听会讲，作为向公众宣传的阵地，讲的方言还必须要标准。

（2）方言＜普通话

这样的形式所针对的受众更为广泛，可以是此种方言的使用者，也可以是并不太熟悉此种方言的游客。在此种形式当中，方言的沟通功用远小于其对于气氛渲染、地域场景再现等功用，是把“方言”作为展览的一部分来使用的。例如，陈云故居要求讲解员在讲解过程中加入评弹的些许唱段，以表现陈云同志所热爱的曲艺样式，再现陈云同志生活的生动细节。

2、电子导览

相比于人工讲解需要大量的对于各种方言的学习培训而言，电子导览显得更为快捷。只需在现有的导览器中加入几段方言导览词即可。在北京故宫的电子导览器中的讲解就分为普通版、王刚“和珅”版、鞠萍姐姐版等，以凸显其特色。就我们馆而言，若是加入上海川沙等方言版，定可成为我馆导览器特色之一。在实际工作中，也有游客询问有没有广东话导览的情况。所以，在导览器中加入方言版本，不仅可以提供游客更为丰富的选择，更可以形成我馆的一个特色。

3、方言讲解操作的问题

（1）标准化

相比与普通话，方言的标准化教程是欠缺的。就拿我们最为熟悉的上海话为例，虽然我们每天生活在上海话的环境当中，但是能准确自然地发出尖音、团音的又有多少？再提到上海话的教程，由于方言更多的只有语音而没有文字，所以要规范地写出来，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现在更多的是用普通话的谐音去标注，这种做法无异于用中文标注外语的读音，没有逻辑性，难以记忆。提到文字，倒是广东话的“白话”更完善一些，有独特的文字，也有约定俗成的语法。

（2）敢于实践

我馆讲解员团队的现状是年轻的 80 后，而 80、90 后在“推广普通话”中成长起来，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要敢于在公开场合正式地说出上海话已经很难，更何况是运用那些后天学习到的广东话、闽南话，在广东人、福建人面前讲，总会怕露怯、会怕被笑话。

（3）寻找导览器发言人

方言节目的播音员应该是首选的，其次，在笔者负责的我馆学生志愿者当中，也不乏广东、福建等各地的同学，但在实际征询过他们之后，发现广东与香港、澳门等地运用的广东话大体是相似的，但是闽南话的差异性就比较大，福建是个多山的省份，有时隔一个山头，说的话就会有差异，这部分的问题仍有待研究。

（下转 28 页）

声名鹊起的名人故居“铁三角”

——游宋庆龄、巴金、钱学森纪念馆

撰文 / 顾林华

近日，随着上海钱学森图书馆和巴金纪念馆的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以宋庆龄故居为中心的三大国家级名人故居（纪念馆）的“铁三角”俨然形成。何以见得？笔者从近几日游览宋庆龄、巴金、钱学森纪念馆归来后，颇以为是。

其一：国之瑰宝

三大名人蜚声海内外，其品行为世人所敬仰，其故迹为游客所追捧。从早已成为热点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宋庆龄故居来看，来自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已经成为该馆人流中的常态了。我作为故居的志愿者，多次参观过宋庆龄故居，曾目睹来自上海财经大学 150 多名学生，在宋庆龄的汉白玉雕像前进行入党宣誓，把故居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也曾遇见天真的孩子们从苏州来到上海，就是为了能够亲眼看看宋奶奶家里纯洁的和平鸽和那郁郁葱葱的百年樟树，其情其景感染了周边的人，自己也仿佛又回到了那充满了纯真的年代。巴金故居是我心仪已久的，开馆不久我便来到这里，没想到正逢高峰时段，为保护古建筑和人流的有序，馆方在时段上作了限制，我老老实实的在大门口排队等候了半个小时才得以进去。而才开放的钱学森图书馆在开馆的第一天人流如潮，不得不实行限流。我去的那天虽然没有排队，但馆内还是人头济济，在大门处取票后方能进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近才开放的巴金故居纪念馆、钱学森图书馆的接待和布展会不断成熟起来，并必将跻身于被称之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故居之列，成为游客所持续关注追捧的旅游新热点。

其二：风格迥异

毋容置疑，三大故居（纪念馆）所体现的伟人精神具有一脉相承的包容性、相通性，但它们所展示的风格却迥然不同。宋庆龄故居不仅是宋庆龄多年的工作、生活之地，也是宋庆龄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国内外政要名人在这里所留下的足迹，似乎是更多的从政治层面上，揭示了一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所走过的历程，给人以和平正义的力量；巴金故居位于上海武康路上，巴金在此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故居客厅里由著名画家黄永玉绘制的巴金肖像画和配画诗“你是谁”，仿佛还在继续着人们的对

话。这时穿过太阳间铺洒在层层书架、写字台、沙发旁的明媚阳光，使人恍惚间感到阵阵书香飘来，恍如看到巴金沉静思索的身影，这一切似乎是更多地从文化层面上，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后半生的生命历程和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给人以文学艺术的力量；而走进钱学森图书馆，那由二炮部队捐赠的、被称为镇馆之宝的中近程导弹高高耸立，在发射地下控制室实物原型的相衬下更显威武，真切的显示了“原子弹之父”的超凡智慧所带给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无比的震撼力，而这又似乎是更多地从科学层面上，诠释了什么是人民科学家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完美结合，给人以科学技术的力量。不同风格的纪念馆所展示的文化多元性、丰富性，并集中存在于一个具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区域里，这正是游客们所期盼的一件幸事。

其三：互为近邻

从三大故居（纪念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宋庆龄故居处于铁三角的中心，巴金故居和钱学森图书馆则分列于它的左右两侧，分别相距不过约 1 公里多。无论步行从宋庆龄故居出来右转弯，沿着淮海中路前行至湖南路、武康路的巴金故居，还是左转弯前行到华山路的钱学森图书馆，都不过是 15 分时间即可到达。而如果时间宽裕的话，你则可缓步漫行在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马路上，还能处处观赏到很多名扬上海的老洋房、老建筑，那比比皆是的“重点保护建筑”的铭牌，会悄悄向你叙说它的历史故事，更不用说走进宋庆龄故居、巴金故居所能亲身体验到的铭牌内涵，以及在别具风格的钱学森图书馆旁，凝望着具有浓重的历史沧桑感的交大老校门、老图书馆、老教学楼。

如果说以宋庆龄故居为中心的名人故居“铁三角”，是得益于特定的区域位置，那么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挖掘这个潜力。对名人故居“铁三角”的积极宣传、引导和形成互动的机制，是当下旅游主管部门应该做的，也是游人所需要的。每当笔者在宋庆龄故居提及周边的巴金、钱学森纪念馆时，大都得到游客的热烈反响就是一个例证。

三大名人故居（纪念馆）是徐汇的骄傲，是上海的骄傲，她所积淀的深厚的历史文化、高雅的建筑风格和丰富多彩、价值连城的收藏品，无不展现了她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品质，使人从中领略到了伟人的力量。声誉鹊起的宋庆龄、巴金、钱学森纪念馆，必将会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具魅力的名人故居黄金搭档的“铁三角”，吸引众多的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尽心而归。

（作者系故居讲解志愿者）

（上接 26 页）

结语

综上所述，方言运用于我馆的讲解过程当中，不仅是可行性的，甚至有其必要性的存在。宋庆龄作为上海的女儿，更是上海的骄傲，在她的家里讲“上海话”无可厚非；加之，当今社会对于方言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大量的资源与机遇在这股保护方言的风潮当中涌现出来，若将内因与外因同时作用，那带来的效果将是事半功倍，甚至是利在千秋的。

在听了千篇一律的标准普通话的讲解之后，个性化的讲解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仍需拿捏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以免弄巧成拙。

德意志历史博物馆游记

撰文 / 高海涛

2011 年 9 月我游历了德国，德国是欧洲头号经济和政治强国，风光秀美与摩登现代共存。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博物馆肯定是我的目的地。怀着一份期待，我参观了位于东部柏林的德意志历史博物馆。

在进馆之前，我就很好奇，把一个国家的历史作为主题会不会让这个命题太大了，会不会产生一些歧义或者误解，如果详略和侧重没有把握好，就会让这个展览变得很糟糕；而单单以时间来划分又会让展览变得很程式化。带着问题我开始了当天的参观。

通过阅读前言我得知德国人的祖先与凯尔特人（CELTS）、罗马人有着比较深的渊源，现代德国人很少自称为日耳曼人，其实日耳曼只是当时部落的名称。凯尔特人是公元前活动在中欧有着共同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民族的统称。

在陈列的第一个部分我就被一种小抽屉迷惑了（图一），打开之后我看到的是不同的泥土样本。阅读之后才得知为了更好地告诉参观者德国土壤构成以及文物出土的土层，陈列者将不同的土层按照顺序进行了说明。对非专业人员而言，有些抽象的概念是不容易弄懂的，既然博物馆是知识的媒介，带给参观者更直观的认知确实是个好主意。（图二，一个参观者在认真观看标本说明）

古凯尔特人作战勇猛，所以在文字可以记录他们的历史之前，能记录历史的就是他们的武器。公元 4 世纪之前称为史前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古凯尔特人与入侵的罗马帝国不断爆发冲突，这些古罗马时期



▲ 图一

▼ 图二



的剑无声地诉说着远去的峥嵘岁月（图三）。公元 5 世纪，德国进入了立国时期，这时候他们的铸剑工艺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盔甲和盾牌也进入了发展期。这一套是公元 8 世纪骑士的装备（图四），但是下面的说明却发人深省：“人所穿的部分超过 100 斤重，马的盔甲也有 100 斤重，虽然盔甲能够保护骑士免受致命打击，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骑士穿着盔甲作战会精疲力竭，而且他们是敌人进攻的首要目标。每次战斗结束之后骑士都会祈祷下一场战斗能够去做步兵。同时，盔甲对马而言是极大的痛苦（great torture）。” 给我感触的是最后的那句说明，torture 是个很重的词，有精神和肉体极大的痛苦之意。一个博物馆人会去考虑不会说话的动物的感受，这句话看似和整个展览无关，但是却让我感受到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石——人性。

这些是作战时穿的盔甲（图五），上面的那些叫锁甲，下面的盔甲穿在锁甲之外。锁甲可以更好地保护战士身体免受尖锐的武器的伤害。究竟锁甲是什么材质的，用什么工艺做的，有多重？这些问题在旁边有具体说明。这是博物馆按照当时的条件、工艺手工打造的锁甲。你可以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当时我特地找了一个小观众做了我的模特，就是为了打破很多国内博物馆冷冰冰“禁止触摸”的惯例（图六）。文物必须要有生命力，哪怕它再珍贵，如果它已经从民族的记忆里消失了，它存在的意义就不重要了。我希望在中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可以触摸的展品，让文物展览“活”起来。

高大的日耳曼人作战勇猛，这里陈列的都是 18 世纪从古战场发掘的中世纪的剑。有 3 把剑是单独陈列的，但是剑的最上端都是平的（图七）。还有一些剑（图八）上面的说明是这样的：“这些剑是用于执行砍头用的，砍头是人类发明的残酷而野蛮的刑罚，在我国（德国）实行的时间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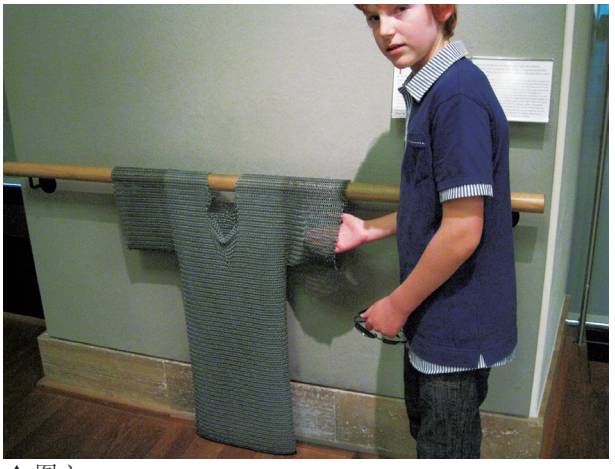
◀ 图三



◀ 图四



◀ 图五



▲图六



▶图八



▶图九

▼图七



不长。”看了这些说明，观众不会去思考太多关于砍头的种种细节，不会对人类发明的各种恐怖的刑罚津津乐道，只会有一种心灵的宽慰，不只为那些曾经受罚的人们，也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感到欣慰。

随着时间的推移，手工艺取得的进步越来越大，博物馆里展示了一个头盔是 14 世纪骑士用头盔（图九）。单单一个头盔就重达 30 斤。这个头盔无法直接穿戴，需要先戴好皮革或棉布制作的头罩再将头盔穿好。为了直观地表现出来，德意志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方法让观众一目了然。说明也非常有意思：“该头盔是在德国某古战场被单独发掘出土的，头盔的主人很可能已经死了。”看样子好的装备也不是无敌的，算不算是对战争的一种讽刺？

到十八世纪末，盔甲越来越完善，但是对马这个承载者而言也越来越难以承受。枪的发明把盔甲和武器的概念颠覆了，把人从沉重的武器和厚重的盔甲里解放了出来，这是现代骑兵的雏形。而积累的手工技术则更广泛的运用于生活器具，大概这

也算是欧洲高超手工艺和闻名世界的审美传承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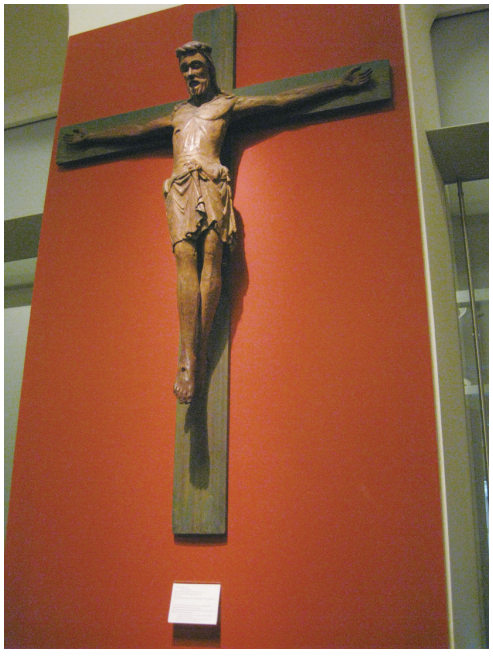
看完整个展览之后，对于参观前我所想的问题我有了自己的理解。当时我觉得“德意志历史博物馆”这个主题太大，会不会有太全面或者太轻描淡写的问题。但是整个展览主题非常连贯，武器的进步就是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还有其他两条主线，分别是宗教信仰和艺术文化。

宗教部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耶稣形象的演变过程。开始时宗教是通过人的传述开始的，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就需要一个具体化的形象。耶稣的形象产生于中世纪（13世纪前后），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可。我站在高大的耶稣受难像前（图十），确实感受到了那种神圣的感觉，即便我身在博物馆而不是教堂。之后耶稣受难像有过进一步的发展，为了表现耶稣所受的痛苦，有那种肉也开始腐烂并露出骨头的形象，但是没有我们看到的这幅传播深远，可以说现在耶稣像就是从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

艺术中油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我在一幅非常大的路易十四像前停留了很久（图十一）。我试图给这张画拍照，但是我发现卡片机在这个距离内无法完成它的使命。这张画像长超过了 3 米，高超过了 1.5 米。画中的路易十四雍容华贵，毕竟他确实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他自称太阳王，对外战争节节胜利，一度让沙俄贵族讲法语的比讲俄语的多。他的生活确实非常奢靡，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着的白色长袍都是由白鼬皮制成的，一个黑点就是一张白鼬。他的表情是那么傲慢，站在他的像前能够感受到他权利的威严。

中国的文化非常灿烂，我相信有很多的外国友人也会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把我们的文化传承好，先从自身上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认同，才能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与国外还有些差距，不过只要我们努力，这些差距会越来越小。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我充满信心。

▼ 图十



▼ 图十一



一个台钟的背后

撰文 / 宫洁菁

宋庆龄使用的钟表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主楼内陈列有 6 个钟，一楼厨房一个挂钟，二楼所有房间包括打字间和内阳台各一个座钟。除展出的这 6 件之外，工作人员在宋庆龄的遗物中还整理出多件各式旧钟表。所有钟表的外形、款式都很朴素简洁，品牌也不尽相同，共同的特点就是数字明显、刻度清楚，而且都较陈旧。可见宋庆龄并非钟表的收藏者，而是确实在使用这些钟表。

宋庆龄对钟的倚赖和要求可以从她与友人的通信中看出一二，“……没有这个瑞士钟我就没有办法工作。它是瑞士制造的，皮革的，方形，上面是阿拉伯数字。我喜欢普通的钟，手动上发条，不喜欢那些靠电池走的……”[1]；“你能给我寄一个瑞士产或是德国产的有阿拉伯数字的方钟么，就是那种用棕色皮革制成的叫做 Europa 的东西……”[2]；“……看见两座漂亮的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了。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如此清楚，即使在远处人们也能看到几点了。”[3]

据曾去宋庆龄寓所拍摄照片的徐大纲先生（已故）回忆，宋庆龄非常有时间观念，她不喜欢客人晚到或者早到。所以，走时精确的钟表作为报时工具对于宋庆龄的工作和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与众不同”的小台钟

宋庆龄遗留下来的这些钟表大多是她使用过的，惟有一个小台钟“与众不同”，它对于宋庆龄的意义显然不止报时器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纪念品而保存下来。历经 80 多年的岁月变迁直至今天，这个台钟更显示了其巨大的历史价值。

台钟呈正方形，边长 9 厘米，黄铜制，表面一圈数字刻度呈圆形、黑色，中心三



▲ 瑞士尊皇台钟



1927 年 12 月 1 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

根顶端形态各异的针区别时、分、秒，背面有支架，供放置。台钟正面的商标是 JUVENIA（尊皇），背面两侧分别刻有两列小字：“介石先生美龄女士结婚志喜香港李星衢黄砥江敬贺”。专业人员调试后，发现这个“年届百岁”的台钟到现在还能运转。

显然，台钟是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介石、宋美龄结婚时的贺礼；送礼人是香港的李星衢、黄砥江二人；品牌是瑞士的“尊皇”；这份蒋宋联姻的贺礼最终是由两位当事人的二姐宋庆龄保存下来的。这个小巧的台钟蕴藏了太多的信息值得探究，笔者一一进行了梳理和考证。

“世纪婚礼”

1927 年 12 月 1 日，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由于宋家尤其宋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蒋介石也因此开始信奉基督教，所以婚礼分两次进行：先举行基督教婚礼，后举行世俗婚礼。

基督教婚礼在西摩路 139 号（今陕西北路 369 号）宋宅会客厅中举行，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只有少数近亲参加。随后，两位新人赴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华饭店举行世俗婚礼。这场盛大的婚宴引起了举世瞩目，被口口相传为“世纪婚礼”。婚宴设在大华饭店跳舞厅，四周缀以鲜花，中间悬挂孙中山标准像，两旁是国旗、党旗，乐池里是一支俄国管弦乐队。参加婚礼的有 1300 多人，许多中外知名人士济济一堂。有证婚人蔡元培、谭延恺、王正廷、余日章、何香凝、李德全、蒋锡侯；来宾有汪精卫、吴稚晖、邵力子、陈果夫、褚民谊、缪斌、叶惠钧等；外宾有英国总领事西德尼·巴顿、挪威总领事 N·阿尔、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法国总领事 M·纳吉亚尔、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克·L·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约翰·邓肯少将等。邵力子担任婚礼司仪，蔡元培宣读证婚书。蒋介石身穿大礼服，胸悬彩花；宋美龄身穿银色旗袍，头戴花冠，手捧玫瑰花。[4] 所有仪式完成后，两人返回西摩路宋宅，蒋介石拜见岳母倪太夫人及亲属，并请中华照相馆摄影社补照了结婚照。晚上，宋宅设宴款待新郎、新娘及亲友。随后新婚夫妇前往莫干山度蜜月。[5]

这场奢华的婚礼引得当时上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有关婚宴细节的描述比比皆

是。既有上千人出席，贺礼自然也是数不胜数，宋庆龄保存下来的这个尊皇台钟只是其中微小的一件，但丝毫不能因此而低估它的历史价值。目前大陆范围内完好保存的蒋宋联姻的贺礼不能说只此一件，却也不可能有很多。

也正得益于宋庆龄的悉心收藏，在钟背面刻字的送礼者李星衢、黄砥江，这两个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名字，走入了笔者的视线。

送礼者其人

李星衢，名连贺，字轸明，号星衢，1879 年出生在有着“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广东台山，1955 年在香港辞世。李星衢在台山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称“三台人杰”。

勤奋好学的李星衢年轻时就在香港开设实业，倡办康年银行；督办广东造币厂，先后任广东银行、新宁铁路公司、四邑轮船公司、油麻地小轮公司及各保险公司董事。他在商品流通、中外贸易、融通资金、民众储蓄、华侨汇兑、扶助实业等多方面都成绩斐然。事业有成的李星衢时时把台山老家放在心上，积极投入振兴家乡的事业中。他出资发起筹建台山第一家正规医院台山县立医院（今台山市人民医院）；兴建台山女子师范学校（现台山华侨中学）；资助日新小学、敬修中学；建造太平戏院（现人民电影院）。现在台山的很多教育、卫生、文化、交通设施都是以“李星衢”命名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星衢还涉足政治。作为广东同乡，他竭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3 年他曾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星衢又以海外著名侨领的身份成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政员。

黄砥江和李星衢一样，也是广东人。



▲ 尊皇商标

他钻研西医，是广州当地著名的西医师。他与广州的绅商和各界人士一起捐募资金，创办了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之后又设立了附属的公医医院，任校董事局主任董事。

同为广东人，又同样创办过医院，黄砥江与李星衢相识就不足为奇。因为李星衢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两人一起送贺礼给新婚的蒋介石也是顺理成章的。

两位知名人士送的新婚贺礼是一个钟，依民间流传甚广的说法看，难免有些令人费解。其实不然。事实上钟从来都是福祉、富裕、吉祥、兴盛的象征。最初的钟是青铜铸造的乐器和礼器，“钟鸣鼎食”是王公贵族富贵荣华的写照，巨型铸铜钟更被视为皇权君威的象征。钟声是德音，也是福音，能祈福纳寿、驱邪祛病。明朝万历年间，西洋钟已被作为最珍贵的贡品由意大利传教士带入皇宫。到了清代晚期，钟表成了清宫皇后嫁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件。现代，在国家外事活动、重大庆典中“送钟”也是屡见不鲜。如 1991 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出访苏联，选用了“北极星”牌石英钟表作为国礼；之后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李鹏出访印度，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出访哥伦比亚，也选用了“北极星”牌落地钟作为赠送对方的国礼。

可见“送钟”即“送终”的说法纯粹

是以讹传讹。送钟不仅不代表不敬或不祥，更显示了送礼者对对方的尊重和美好祝愿，名贵的瑞士钟表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尊皇”（JUVENIA）

李星衢和黄砥江赠送的尊皇台钟系瑞士品牌。1860 年，制表匠师积·狄狄逊（Jacques Didisheim）在闻名世界的“钟表山脉”——瑞士西部汝拉山谷的小镇圣依来亚（St. Lmier）创立了尊皇表，开设了他的第一家制表工厂。

在狄狄逊的引领下，尊皇品牌蓬勃发展，成为当时时尚的象征，也受到了清朝皇室的青睐。故宫博物院的钟表馆里陈列着一个怀表，18K 黄金制作，前盖上绘制身着对襟褂的男子，后盖上绘制一名身着清代满族服装的女子，白色珐琅盘面，表盘上有 JUVENIA 的厂标，表壳内侧同样有 JUVENIA 的标记。推测是当时清宫向尊皇定制的纪念表。现在，这个怀表成为了瑞士尊皇品牌辉煌过去的一个象征。

1910 年以后，尊皇为寻求发展而积极参与钟表界的各个领域，至此他们不仅生产表，也开始涉足时钟及时钟零件领域。李星衢和黄砥江赠送给蒋介石、宋美龄的这个台钟就是制造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尊皇钟表发展的鼎盛时期。他们应是从瑞士订购，然后请人在钟背后刻上了贺词。

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石英钟表的出现，传统的瑞士钟表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尊皇也不可避免地历经了难关。现在，尊皇正为重塑品牌形象而努力，积极为全面打入中国市场寻找突破口。

纵观尊皇品牌发展史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营产品是手表，“尊皇表”是为人所知晓的一个品牌，而尊皇出品的钟相对来说数量要少很多。物以稀为贵，可见宋庆龄保存下来的这个近百年前的尊皇钟就其本身的经济价值而言也是不可估量的。

流传经过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贺礼，由宋庆龄保存，看似不合理，却有其内在必然性。

前文已述，蒋宋的婚礼是在西摩路 139 号宋宅进行的，两人结婚时尚未在上海置产，直至 1928 年才迁入由宋子文出资购买的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9 号。所以，结婚当时的贺礼应该都是放在宋美龄婚前的住所西摩路 139 号的。1928 年迁居时，宋美龄可能带走了一批，但极有可能还遗留了一些在西摩路，包括这个并不很起眼的小台钟。

1931 年宋母倪珪贞病逝，远在德国的宋庆龄即刻回国奔丧。此后，西摩路 139 号多由宋庆龄料理使用。自然，宋美龄婚前和结婚时未带走的东西，也在宋庆龄的保管之中。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掩护下，乘坐法国油轮离沪赴港，笔者认为在这种危急关头宋庆龄不至想到去老宅拿上那个小台钟带在身边，台钟应该是一直都存放在西摩路的。幸运的是抗战结束宋庆龄回到上海时，这个台钟未遭日本人的洗劫，仍然安在。之后，宋庆龄把西摩路宋宅辟为收容难童的场所，可能就在这之前，房子内的一部分东西被宋庆龄搬到了自己的寓所，包括这个台钟。

就这样，宋庆龄妥善保存着台钟，直至 1981 年去世。台钟到现在还光亮如新，并且能够运转，一方面是因为它品质高做工精，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宋庆龄的悉心保存。如此周到地保存着妹妹、妹夫的结婚贺礼，或许也可以说明，出于对亲情的珍视，宋庆龄对这段婚姻的态度是从反对到默认的。

1927 年 12 月 1 日蒋宋结婚之日，宋庆龄正旅居苏联。多年前蒋介石表达想与宋美龄结合的意愿时宋庆龄是竭力反对的，她说“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

男人”。[6] 那么最终两人确实结合了，宋庆龄又作何反应？1928 年 1 月 22 日她在苏联写信给友人，“……你一定已经听说美龄嫁给蒋介石的事。这真让我吃惊！似乎宋家的成员都喜欢让别人吃惊！去年八月我在家里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海参威，我离开前几个小时还在和孔夫人、美龄一起吃饭呢！……”[7] 可以看出，这时候她并没有愤怒或者生气，只是吃惊，甚至拿自己突然离家出国的行为与美龄嫁给蒋介石的行为类比，颇有一家人“惺惺相惜”的感慨。或许是对小妹的疼爱，也或许是在苏联有了新的收获，当时宋庆龄内心并没有对蒋宋联姻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更没有责怪宋美龄的意思。

1929 年 5 月，宋庆龄从苏联归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典礼结束后，于 6 月 2 日至 9 月 21 日暂居沪上。在此期间宋庆龄多次与母亲及姐妹弟弟们团聚。9 月 13 日，宋庆龄与倪珪贞、孔祥熙、宋蔼龄、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仪等在贾尔业爱路 9 号宋美龄寓所共叙天伦。从宋庆龄保存的一套照片和照片后面宋庆龄的亲笔标注可以看出，这次聚会很热闹，三姐妹围着老母亲，频频合影，宋庆龄很开心，也很珍视这次聚会。此后一周，宋庆龄又再次出国，前往欧洲。

之后的史实表明，虽然宋庆龄对蒋介石一直心存芥蒂，但她从未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漠视与宋美龄的姐妹亲情。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不管相隔有多遥远，宋庆龄心里始终为姐妹保留着一份祝愿。或许这也正是这个小小的台钟背后所蕴含的情愫。



▲1929 年 9 月 13 日，倪珪贞与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在贾尔业爱路 9 号合影。

[1] 宋庆龄 1977 年 6 月 2 日致邓广殷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2] 宋庆龄 1977 年 6 月 2 日致邓广殷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3] 宋庆龄 1977 年 6 月 26 日致邓广殷信，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4] 杨树标、杨菁：《宋美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版，第 33 页。

[5] 王志鲜、段炼编著：《宋庆龄在上海史记寻踪》，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 8 月版，第 132 页。

[6] 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 新华出版社，1987 年 4 月版，第 131 页。

[7] 宋庆龄 1928 年 1 月 22 日致范妮·波默罗伊·布朗信，耶鲁大学藏。

宋庆龄收藏的木刻版画

撰文 / 麦灵芝

宋庆龄收藏的木刻版画，既有散页的木刻作品也有汇聚成册的专集和多幅的木刻连续画，主要是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新兴木刻创作高峰期的作品。

新兴木刻与宋庆龄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是在鲁迅倡导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将德国著名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介绍到中国，更将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左派革命精神进行大规模的传播与宣传。新兴木刻运动，突出代表着为人生、为大众而艺术的思潮，成为左翼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鲁迅的倡导下，各种版画团体相继出现。一批反映民族灾难、民众疾苦、反对专制统治的作品纷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以艺术的语言表达着对社会的种种看法，发挥着超越艺术之上的社会作用。这时的木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而是战斗的工具。新兴木刻这种超乎寻常的战斗锋芒，必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打压，但它却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全民抗战开始后，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木刻这一艺术形式遇到了发展的契机。木刻简便易行、可以无限复制的特点，使得木刻的创作和艺术表现形式较容易与现实斗争结合，从而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时期形成了新兴木刻版画的创作高峰期，并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成为那个年代最能够与世界交流的艺术形式的代表。许多国际友人认为他们是通过木刻版画来了解中国的。

30 年代，鲁迅在积极倡导新兴木刻的同时，还是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宋庆龄与鲁迅在反对白色恐怖、争取民权的斗争中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她对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也是积极支持。1934 年，宋庆龄和鲁迅一起挑选了 55 幅中国木刻和绘画作品交给法国一杂志的女记者琦达·谭丽德带去法国展览，这个名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后来又移至莫斯科展出，宣传了中国新兴的木刻艺术。1936 年鲁迅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版画集在新兴木刻运动中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木刻青年，在创作思想或是表现技法上，或多或少受到过珂勒惠支版画的影响。当年这本版画集鲁迅只印了 103 本，其中一本送给了宋庆龄。

宋庆龄与青年木刻家也有过交往，陈烟桥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受鲁迅和宋庆龄

的委托为版画的出国展览收集木刻作品。抗战时期，陈烟桥与叶浅予等在香港举办《抗日宣传画展》，宋庆龄闻讯前往观展，她鼓励画家们用画笔为抗战出力，还同陈烟桥和丁聪合影留念。上海解放前夕，陈烟桥被国民党诱捕，陈的妻子向宋庆龄和许广平求助，是宋庆龄等人通过多方努力，才使陈烟桥重获自由。

青年木刻家汪刃锋是“全国木刻协会”理事，负责展览部的工作。当年他常和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保持联系，通过基金会，把中国新兴木刻拿到欧美等国去展出。1947 年 6 月他专程把自己出版不久的《刃锋木刻》一书赠送给帮助他的孙夫人。木刻青年杨可扬也曾专门挑选了两幅自己的木刻作品题赠孙夫人。足见宋庆龄在这些木刻青年心目中的地位。

1946 年 9 月 18 日，“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举办 “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这个展览得到了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十余位著名人士的热情赞助，展出的作品一半是解放区的作者，一半是国统区的作者。展览结束后，又赴英国、比利时、日本等地展出。之后，宋庆龄主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还通过廖梦醒向“全国木刻协会”征集木刻作品，送往美国和加拿大展览。这些木刻版画的国际活动，扩大了中国木刻在世界艺术领域里的影响，也使更多的国家从作品中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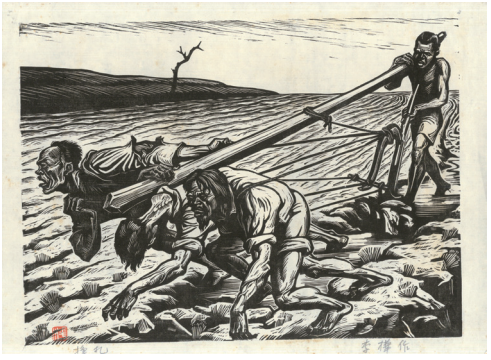
宋庆龄收藏的这些新兴木刻版画，既有国统区的作品，也有延安地区的作品。虽然都是 40 年代的作品，但不能否认，因为地域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二者在内容题材、表现形式，作品的风格与追求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国统区的木刻版画

宋庆龄收藏的国统区的作品，都是散页，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却不乏经典之作。这部分版画内容基本上都是描绘国统区大众的生存状态、揭露社会的黑暗，包括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民的反抗等等。这些既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这一时期国统区木刻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比如反映劳动大众生活的作品有李桦的《放工》、《赶洋船》、龙廷霸的《制木磨》、陆田的《拾煤》、蔡迪支的《烦恼的爸爸》、徐甫堡的《卖肩者》等等。日本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平尼的《流亡》、董荡萍的《等待疏散车》刻画的就是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的生活困境。1946 年内战期间，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抽丁抢粮，民不聊生。木刻家们参与了当时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他们用刻刀表现人民的苦难与抗争。李桦的《挣扎》、《抗粮》、杨纳维的《工赈队的骚动》、李志耕的《人民的苦难》、陆田的《待赈者》、陈田颂的《抓丁》等都是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作品。

在这些国统区木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版画家首推李桦。他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后留学日本，30 年代初就从事新兴木刻运动，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奠基者。他的作品常以悲壮、崇高的美学风格震撼人心。艺术大师徐悲鸿在观看了一次全国木刻展览会后，撰文称赞李桦“作风日趋沉练，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丢勒”。[1]

宋庆龄收藏的版画中有多幅李桦的作品，其中《挣扎》和《抗粮》是李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怒潮》组画中的其中两幅。《怒潮》组画应由《挣扎》、《抓丁》、《抗粮》、《起来》4 幅作品组成，原名《民变》，是李桦在 1946 年至 1947 年之间创作的作品，最初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民变》之一的《挣扎》创作于 1946 年，发表在 1947 年 1 月《新中华》复刊第五卷第二期上。《民变》之二《 抗粮》、



▲ 李桦《挣扎》



▲ 李桦《抗粮》

之三《抓丁》、之四《 起来》则是 1947 年创作的，发表在 1947 年 4 月 1 日《新中华》复刊第五卷第七期里。后来这 4 幅组画更名为《怒潮》，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但不知何种原因，在宋庆龄的收藏中，却只有这 4 幅组画中的 2 幅《挣扎》和《抗粮》，其余的李桦作品是《放工》、《苦笑》和《赶洋船》。

中国新兴木刻除了学习西方的艺术创作方法，也深受苏联木刻艺术的影响。1943 年 3 月第二届苏联版画展览会在重庆举行，展览会上，展出了部分套色木刻作品。“那种新的技法、新的题材、新的风格，给中国木刻界的影响之大，远非第一次苏联版画展览所能企及”。[2] 受此影响下，中国木刻家们也开始尝试套色版画的创作。宋庆龄收藏的木刻版画绝大部分是黑白色调的，其中也有几幅是套色的，都集中在国统区的作品中。其中有李桦的《苦笑》、陆田的《人民的希望》、蔡迪支的《烦恼的爸爸》、龙廷霸的《制木磨》、杨讷维的《急流》和杨可扬的 2 幅无题作品。这些套色木刻丰富了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杨可扬的 2 幅无题套色木刻还是所有宋庆龄收藏的版画中唯一有作者专门题赠孙夫人的作品。

从宋庆龄收藏的这些国统区的版画作品中，除了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版画作品之外，更能感受到的是版画家们为人生、为大众而艺术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这与 30 年代鲁迅倡导的木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延安的木刻版画

宋庆龄收藏的延安木刻是解放区救济总会林仲 1946 年 9 月 3 日赠送的。林仲当时任解放区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业务主任，其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同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合作，争取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



▲ 杨可扬《无题》

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份额，缓解解放区的困难。所以林仲和宋庆龄时常有工作联系，加之当时“全国木刻协会”正在上海筹备抗战八年木刻展，延安木刻作品也将在展览会中展出，所以，林仲将延安带来的木刻作品赠送宋庆龄也是很自然的事。

抗战时期一批左翼木刻画家和美术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中共的领导下形成了专业的美术队伍，木刻版画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客观原因首先是，抗战艰苦的条件，延安物资的匮乏。木刻因工具简便，因而成了延安美术家的首选。其次，由于木刻具有复制印刷的功能，可以解决报刊杂志缺乏制版设备的困难，所以新兴木刻在延安得到大力提倡。此外，延安相对和平的环境，以及中共的积极扶持和物质保障等，也为延安木刻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延安的木刻家们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研究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审美要求，创造了朴实明朗的民族风格，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古元是延安木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的不少作品因为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当年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展览会上见到古元的木刻后，在报上发表文章，称其为“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兴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3]

宋庆龄收藏的延安木刻包涵了古元、彦涵、力群、罗工柳等 20 位活跃在延安的木刻家的代表作品。这些木刻作品主要是表现边区军民的现实生活和军民抗战。比如罗工柳的《归还投票的豆子》、萧肃的《用豆投票》、张明坦的《妇女先投票》、石鲁的《只有你不合格》都是反映边区民主建设的作品。1937 年 7 月中共在陕甘



▲ 萧肃《用豆投票》

宁边区实行了自下而上的乡、区、县三级的“直接无记名平等普选制”，这一运动的开展不仅对边区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具有影响力，“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边区民主发展印象深刻”。[4]陕甘宁边区俨然成为全国实施民主的模范地区。由于边区的农民大多数都不识字，于是选举除了采用票选的方式外，还采用了一种特有的用投豆的方式来进行。延安的木刻家以此为素材用刻刀生动地描绘了农民参与选举的情景。

古元的《马锡武调解婚姻诉讼》则是反映延安法制建设的一个代表性作品。这是古元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马锡武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他的办案方式，为当时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被称为马锡武审判方式。古元的这幅作品就是根据在当时广为流传的马锡武处理一桩婚姻纠纷案的事迹创作的。《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评述了马锡伍审判方式的特点，认为这是边区司法战线上的伟大创举。古元的这幅作品就刊登在 1944 年 10 月 9 日《解放日报》副刊的显要位置上。

破除迷信，提倡科学，改变旧的陋习，提倡新的社会风尚，也是边区广泛开展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马达的《烧毁偶像》、夏风的《识字板》、《农民读报》、石鲁的《放学回家》等都是描述这一运动的木

刻作品，反映了文化教育是如何悄然地改变了边区农民的生活。彦涵的《农民诊疗所》、郭钧的《宣传新法接生》等作品表现的则是中共如何在落后的边区克服物质和人才缺乏的困难，为提搞医疗卫生水平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在这些延安木刻作品中，刻画内容最多的是反映边区的生产活动。1941 年至 1942 年间，陕甘宁边区为战胜因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在边区全体军民中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延安美术工作者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大生产运动中的场景展现在木刻版画上。古元的《八路军生产》、张明坦《秋收后》、计桂森的《妇女纺纱组》、张望的《八路军帮助蒙民秋收》、石鲁的《妯娌俩》等都是表现军民从事耕地、收获、纺线等各种生产劳动场景的作品。而力群的《变工队劳动前》、戚单的《除草》则是从内容题材上响应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将农业生产“组织起来”的号召，表现农村生产的互助劳动向集体化发展的作品。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许多劳动模范也成为了木刻家刻画的对象，夏风的《劳动英雄归来》、石鲁的《劳动英雄会》、古元的《向吴满有看齐》等都是歌颂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英雄的作品。这些围绕大生产运动而创作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再现激烈、残酷的抗战斗争，歌颂根据地军民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也是延安木刻中的重要题材，其中有彦涵《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奋勇突击》、沃渣的《把牲口夺回来》、夏风的《瞄准》、赵泮滨的《欢送部队上前线》、计桂森的《驻军转移》等作品。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作品。这套 16 幅的木刻连环画是彦涵根据华山写的脚本创作完成的。彦涵



▲ 古元《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



▲ 古元《八路军生产》



▲ 石鲁《妯娌俩》



▲ 彦涵《奋勇突击》

和华山在太行山的时候就在《晋察冀日报》上看过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深为五位壮士的民族气节所感动。回到延安后，两人曾商议要以五壮士的事迹创作一套木刻画。后来，正好五壮士的两位幸存者来延安党校学习，于是华山负责采访并写出脚本，然后由彦涵刻成木刻。这套 16 幅的木刻连环画完成后，彦涵拓印了 5 套，其中一套后来被周恩来带到重庆，送给了美国记者。1945 年美国《生活》杂志出版了这套连环画的精装袖珍本，又被美军观察团带回延安。据说，这本木刻连环画曾发给在远东战场上的美国士兵，以中国军人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他们。这套木刻连环画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日后又被美、苏等国的美术馆收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上的历史见证。宋庆龄收藏的这套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还附有非常详细的英文说明。

显而易见，林仲赠送延安木刻不仅是为了让宋庆龄欣赏边区的艺术成果，更多的是借助版画来展示边区人民是如何生活，以及武装了的人民又是怎样和敌人战斗的情况。延安的木刻创作是以歌颂为主基调，与中共领导边区，开展各项群众运动的内容紧密相联。从这些木刻作品，可以了解中共是如何在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如何把社会变革思想渗透到边区人民的意识之中。延安木刻创造的民族风格也为新兴木刻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庆龄收藏的延安木刻作品是本专集，其中的作品都是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裱糊、装订成册的。虽然纸质比较粗糙，但制作仍不失精良。其中每件作品下面的题目说明和作者的姓名是都是用英文标注，可见是专门为方便宋庆龄的阅读习惯而特别制作的。由于当时延安的物资比较匮乏，拓印木刻的油墨质量比较差，时间长了，木刻作品的轮廓线油墨已经渗出，并向周围晕散开来。这种有着斑驳油渍的木刻作品是延安木刻的时代特征，它不同与以后在条件良好的情况下用原版重新印制的延安木刻作品，因而也成为构成了这些作品珍贵价值的组成部分。

综观宋庆龄收藏的这些新兴木刻版画，无论是国统区的还是延安地区的，虽然因地域和环境的不同，作品显现出题材各异，风格不同的特点，但都继承了新兴木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有着现实的、大众的和革命的艺术特征。这些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木刻作品记录了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是优秀的历史画卷，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宋庆龄不会木刻，也不是收藏家，之所以保存这些木刻版画，自然与她的革命实践活动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关系，与那个时代所呈现的革命家推动文化运动，艺术家参与革命运动的独特面貌相吻合。在新兴木刻运动蓬勃发展的三、四十年代，宋庆龄曾多次帮助中国木刻版画在国内外的展出活动，扩大中国木刻版画在世界艺术领域里的影响，使更多的国家从版画中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这些木刻版画无疑是宋庆龄在这场木刻运动中留下的历史痕迹的最好见证。

[1] 重庆《新民报》，1942 年 10 月 18 日。
[2] 王琦：《中外木刻艺术的交流》，载《新美术论集》，新文艺出版社，1951 年版。
[3] 重庆《新民报》，1942 年 10 月 18 日。
[4]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28 页。

馆藏部分西文图书疏记

撰文 / 王宁宁

上海宋庆龄故居藏书 6000 余册，是研究宋庆龄思想的重要资料。在宋庆龄的遗嘱中，曾将它们全部赠予邓广殷先生。邓广殷先生在得知后表示愿将宋庆龄遗赠给他的藏书捐献给国家，由于邓老的无私，现在这些藏书仍然保存在故居库房内。

1981 年宋庆龄逝世后，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曾组织对故居藏书进行了整理，这次整理的成果，保存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 1987 年 10 月编印的《上海宋庆龄故居藏书目录》（内部发行）一书中。《目录》根据“类别索引”排序，内容包含书籍的“书号”、“文种”、“外文书名”、“中文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日期”等项目。《目录》中收录了故居的大部分藏书，是研究故居藏书的最基本资料。这次整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书橱内书籍的排列原状进行了拍摄记录，保存了原始数据。

在宋庆龄购置和收藏的图书中，西文藏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除占主流的英文外，还有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拉丁文、希腊文、韩语、波兰语等语种的图书若干册。据统计，上海宋庆龄故居收藏的西文书籍在 3000 册以上，内容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本文试图对上海宋庆龄故居所收藏的 1949 年以前出版的部分西文书籍作一番结构分析，以期对宋庆龄的关注重点、视野范围和兴趣偏好作一番映射。



▲故居东书房内藏书

一

故居现存一批 1949 年前出版的世界史、地区史著作。综合性著作，有 Samuel G. Goodrich《彼得·巴里世界历史》（*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American Book Company，

1869），George Rawlinson《古代史》（*Ancient History*，The Colonial Press，1900），James Harvey Robinson《西欧历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Ginn & Company，1903），James Henry Breasted & James Henry Robinson《欧洲史概略》（第一卷）（第二卷）（*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 [Part Ⅰ][Part Ⅱ]*，Ginn And Company，1914），Carlton J. H. Hayes《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第二卷）（*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Volume Ⅱ]*，The Macmillan Company，1918）。研究其它方面历史的著作，有W. 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A History Of Philosophy*，The Macmillan Company，1923），Henry Sidgwick《伦理学史》（*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Ethics for English Readers*，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6）。

国别史方面，有关英国历史的著作很多。通史性著作T. Smollett《英国史（第一卷）（第二卷）》（*History of England[Volume Ⅰ][Volume Ⅱ]*，J. M' Gowan and Son，Great Windmill Street,1825），John Richard Green的《英国人简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Volume Ⅰ] [Volume Ⅱ] [Volume Ⅲ]*，The Colonial Press，1900），Charles M. Andrews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Allyn And Bacon，1903），H. A. Guerber《英格兰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English*，American Book Company，1898）。专史性著作A. M. Chambers《英国宪政史》（*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Methuen & Co. LTD，1911），Samuel Rawson Gardiner编《加德纳英国历史地图册》（*School Atlas of English History*，Longmans，Green，and Co. 1895），加上H. O. Meredith《英格兰经济史概要》（*Outlin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Sir Isaac Pitman & Sons，LTD，1908），共约7种。

有关美国历史的著作也很多。通史性著作，有Woodrow Wilson《美国历史新纪元：1829-1889分裂与重建》（*Epochs of American History: Division and Reunion 1829-1889*，Longmans，Green，and Co.，1898），Woodrow Wilson《美国人民史》（第一-十卷）（*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olume Ⅰ - Volume Ⅹ]*，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New York And London，1917），Mable Pyne的《美国简史》（*The Littl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40），Brooks Adams《马萨诸塞州的解放：梦想与现实》（*The Emancipation Of Massachusetts: The Dream And The Reality*，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9）。专门史，有Carl Russell Fish《美国外交史》（*American Diplomacy*，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9），加上William J. Long《美国文学史》（*American Literature*，Ginn And Company，1923），William P. Trent《美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William Heinemann，London，1903），C.A.Beard &M.R.Beard《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加上Horace E. Scudder《乔治·华盛顿传》（*George Washing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889），Damid Donald《林肯传》（*Lincoln's Herndon*，Alfred A

Knopf，1948），Adrienne Koch《托马斯·杰斐逊生平及其文选》（*The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The Modern Library，1944）。共约12种。

法国历史，是宋庆龄关注的又一个重点。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历史重要的转折点，宋庆龄当然十分关心。故居现存Thomas Carlyle《法国大革命》（第一卷）（第二卷）（*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ume Ⅰ][Volume Ⅱ]*，The Colonial Press，1900），还有W. H. Hudson《拿破仑其人》（*The Man Napoleon*，George G. Harrap & Company，1915）。通史性著作有Ernest Lavisse《法国史》（*D'Histoire de France*，Librairie Armand Colin，1912），加上O.B.Super《法国历史读物》（*Readings From French History*，Allyn and Bacon，1891），Kathleen T. Butler《法国文学史》（第二卷）（*A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Volume Ⅱ]*，Methuen & Co. LTD，1923），Gordon Waterfield《法国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France*，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 W. 1942年），共约5种。

德国历史，宋庆龄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故居现藏有W. Bernhardt《三十年战争史》(*Gustav adolf in Deutschland*，American book Company，1894)，Menco Stern的《德国城市的故事》（*Geschichten von deutschen städten*，New York Cincinnati Chicago American book Company，1902），Harold J. Laski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The Fabian Society and Allen & Unwin Limited，1921），Sir Nevile Henderson的《使团的失败：柏林1937-1939》（*Failure Of A Mission: Berlin 1937-1939*，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TD.，1940）。共4种。

俄国和苏联历史，有Leon Trotsky《俄国革命史》第三卷（*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ume Ⅲ]*，Victor Gollancz Ltd，1934），Lenin、Stalin等《苏联与和平之路》（*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ath To Peace*，Lawrence and Wishart,1936），Albert Rhys Williams的《苏联》（*The Soviets*，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7），J. Stalin《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44）。加上Stella D. Blagoeva《季米特洛夫传记》（*Dimitrov A Biography*，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 In The U.S.S.R.，1934），共约5种。

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看出，宋庆龄还非常重视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过程、历史经验。古希腊史方面的著作有H. A. Guerber《希腊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Greeks*，American Book Company，1896），J. B. Bury《简明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 For Beginners*，Limited MacMillan and Co.，1905），George Grote《希腊史》（卷一）（卷三）（卷四）（卷六）（卷七）、（卷十二）（*A History Of Greece By George Grote [Volume Ⅰ] [Volume Ⅲ][Volume Ⅳ][Volume Ⅵ][Volume Ⅶ][Volume Ⅻ]*，London: Published By J.M. Dent & Co And In New York By E.P. Dutton & Co，1846-1856），George Thomson《古代希腊社会研究》（*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49）。古罗马史方面的著作，有Theodor Mommsen

《罗马史》（卷一）（卷二）（卷三）（*The History Of Rome, [Volume Ⅰ][Volume Ⅱ][Volume Ⅲ]*，London: Published By J.M. Dent & Sons Ltd And In New York By E.P. Dutton & Co，1854），Julian Hawthorne 的《西塞罗演说集》（*Orations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The Colonial Press，1900）。希腊、罗马都曾经是文明古国，曾盛极一时后又衰弱。他们的命运于中国有借鉴意义，这也是宋庆龄对此感兴趣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关于希腊、罗马历史方面的藏书也有很多，宋庆龄对此的关注也有可能受他影响。

故居现存的这些史学著作，大部分都是水准很高的学术名著，像《西欧历史导论》的作者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是美国历史学家，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而《西欧历史导论》是鲁宾逊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一部教科书，占据欧洲历史教科书的市场几十年。威廉·文德尔班（W. Windelband）是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他所著的《哲学史教程》用新康德主义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以往的哲学体系及其发展史，对于研究西方哲学史以及文德尔班本人的哲学思想，很有参考价值。《伦理学史》是19世纪英国著名伦理学家、古典功利主义学说最好的阐述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的重要著作之一，是伦理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美国文明的兴起》的作者C.A.Beard 与M.R.Beard是夫妻，他们获得巨大成功的四卷本的《美国文明的兴起》有着很高的影响力。他们对独立革命所作的详尽的经济学阐释以及美国内战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观点，都广为学界所认可。Damid Donald是美国历史学家，他所写的《林肯传》被历史学界称赞为最好的林肯传记。艾尔奈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的名作《法国史》出版于1903年至1922年间，凡二十七卷，有四十余万字，从古代的高卢，一直写到一九六九年的现代法国。这是一种“为法国（而作）”的历史而不是“法国的”历史，通过这种叙事，国家具体化了认同，确保了延续性并守护了共同体的存在。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同时是一位学者，《三十年战争史》是描写1618年至1648年欧洲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国际战争的书，这本书是席勒唯一一部写作完成的历史著作。该书中席勒主要围绕德意志民族英雄的问题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描写。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苏联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政治家，《俄国革命史》是研究他生平和思想最权威的著作。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是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他写的《希腊史》共有十二卷，格罗特排斥神话，不承认希腊神话是历史证据，此书代表了19世纪中期史学界较正统和主流的看法。多卷本的《罗马史》为作者Theodor Mommsen赢得了诺贝尔奖，是他非常有名的著作。

宋庆龄虽不是历史学家，但历史发展总有其规律性，通过对世界各大文明兴衰、欧美各大国崛起的认识和理解，她积极探索着适合中国之路。

宋庆龄还十分关注美、英等国人士综论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代表性著作，故居中收藏有R. Montgomery Martin《中国政治、商业和社会》（卷一）（*China:Politic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Volume Ⅰ]*，James Madden，1847），《1891年中国排外暴动》（*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1892），E. Harper Parker《诸夏原来》（*Ancient China Simplified*，Chapman & Hall，Ltd.，1908），F. L.

Hawks Port《中国历史概论》(*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Kelly & Walsh, Limited, 1908), Edwin J. Dingle《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Across China On Foot*, J. W. Arrowsmith Ltd., 1911), Frederick McCormick《绚丽的中华民国》(*The Flowery Republic*,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13), Paul Myron Linebarger《孙逸仙与中华民国》(*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The Century Co., 1925), S. Horose《中国阴影面面观》(*La Symphonie Des Ombres Chinoises*, Editions De La Madeleine, 1932), Victor A. Yakhontoff《中华苏维埃》(*The Chinese Soviets*, Coward-Mccann, Inc. 1934), Harold R. 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cker & Warburg,1938), lawrence K. Rosinger《中国战时政治 1937-1944》(*China's Wartime Politice 1937-194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5年),共约11种。

藏书中还有很多是关注中国人的。有Charles Denby《中国及其子民》(卷二)(*China And Her People [Volume Ⅱ]*, L. C. Page & Company,1906),是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名作。Agnes Smedley《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The Vanguard Press, 1933), Winifred Galbraith《中国人》(*The Chinese*, Penguin Books, 1942), Anil De Silva《中国妇女与自由》(*Chinese Women And Freedom*, P. R. Bhide For Kutub Publishers, 1945),共约4种。

解决中国问题,既要认清世界潮流,又要认清中国国情,而认清中国国情,并非易事。这些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作,让宋庆龄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这些著作有些有其片面性,甚至会有一些偏见,但是与本国历史文献相结合相补充,必定有助于宋庆龄对中国国情获得较为真切的认识。

二

除了历史,宋庆龄当然更关注现实。现代文明为社会带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它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深刻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积重难返,经济危机愈益频繁,社会问题愈加严重。B. L. Putnam Weale《种族斗争》(*The Conflict Of Colour*,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0), J. D. Rees的《当代政治问题(英国)》(*Current Political Problems*, Edward Arnold, 1912), Lyman P. Powell《骚动的社会(第一册)(第二册)》(*The Social Unrest [Volume Ⅰ] [Volume Ⅱ]*, The Review Of Reviews Company New York, 1919),这些书都表明了宋庆龄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这两种迥异的思潮以不可阻挡的趋势传入中国,宋庆龄的藏书中也有所反应。W. Lawler Wilson《社会主义的威胁》(*The Menace Of Socialism*, Grant Richards, 1909), August Bebel《妇女与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 Socialist Literature Co., 1910), William English Walling《社会主义》(*Socialism As It Is a Survey Of The World-Wid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Macmilian Company, 1912)。Karl Radek《资本主义奴役与社会主义劳工组织》(*Capitalist Slavery Versus Socialist Organisation Of Labour*, Centrizdat, 1931),《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Fascism And Social*

Revolution，Martin Lawrence Ltd.，1934）。

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与博爱，要实现唯有靠民主与法治。宋庆龄自幼深受西方价值观的熏陶，她对西方民主思想也有一定的了解。从故居现存藏书中，可以归纳出几个侧面。

其一，关于政治学概论。有Arthur Christensen《政治和大众道德》(*Politics And Crowd-Morality a Study In The Philosophy Of Politics*，Williams And Norgate，1915）一书。

其二，关于政治民主与政治自由。有Alexis 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册）（第二册）(*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Ⅰ][Volume Ⅱ]*，The Colonial Press，1900），Harold J. Laski的《美国的民主》（*The American Democracy*，The Viking Press，1948），共约2种。

其三，关于法治建设理论和宪法、法律建设。阐述宪政方面，有A. M. Chambers《英国宪政史》（*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Methuen & Co.,LTD）。阐述法治理论的综论性著作，其中有Baron De 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第一册）（第二册）(*The Spirit of Laws，[Volume Ⅰ][Volume Ⅱ]*，The Colonial Press,1900），Gustavus Myers《美国最高法院的沿革》（*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Charles H. Kerr & Company，1912），William Bennett Bizzell《政治理论的法律解释》（*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G.P. Putnam's Sons，1914），约3种。还有一些在推行民主与法治中特别富于应用性与可操作性的著作，像Julius Henry Cohen《工业法规》(*Law And Order In Industry*，The Macmillan Company，1916），A. S. Harvey《进出口商法律及报关手续》（*Import And Export Trade:Law And Customs Procedure*，Sir Isaac Pitman & Sons, LTD.，1922），Thomas F. Millard《在华治外法权的结束》（*The End Of Exterritoriality In China*，The A. B. C. Press, 1931），Frederick Bernays Wiener《军事法庭诉讼程序》（*Military Justice For The Field Soldier*，The Infantry Journal Washington,1944),Mrs. Mithan Lam《一部全印国民法典》（*An All-India Civil Code*，Thacker & Co.，Ltd，1947）等，共约5种。

其四，关于政府的具体操作问题。Charles Grove Haines & Bertha Moser Haines《政府的结构与问题》(*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Government*，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Alex L. Peterman《民主政府的构成》（*Elements of Civil Government*，American Book Company，1903），James W. Garner的《美国的行政机构》（*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Book Company，1911），共约3种。

宋庆龄所处的时代，世界局势变幻莫测。故居有相当多的图书说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Iichiro Tokutomi《日美关系》（*Japanese American Relations*，The Macmillan Company，1922），John Strachey《未来的权势之争》（*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Victor Gollancz Ltd，1933年），Edgar Snow《远东战线》（*Far Eastern Front*，Harrison Smith & Robert Haas, 1933），Upton Close《挑战：在日本外观的背后》（*Challenge: Behind The Face Of Japan*，Farrar & Rinehart Incorporated Publishers，

1934），G. D. H. Cole 等《为英国制定的计划》（*Plan For Britai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43），Nathaniel Peffer 的《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The Viking Press，1945 年），Owen Lattimore《亚洲的决策》（*Solution In A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5），Edgar Snow《苏维埃政权的模式》（*The Pattern Of Soviet Power*，Random House，1945），Owen Lattimore《亚洲形势》（*The Situation In Asia*，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9），共约 9 种。从这些藏书可以看出，当时宋庆龄是有目的地了解世界局势的，这也为她的政治判断和决策做出了参考。

让中国真正实现政治民主与法制健全下的社会自由一直是宋庆龄的目标，不管她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好，参加救国入狱也罢，都是对当时政权下社会民主的极度缺失所作的反抗。宋庆龄在这些藏书中汲汲吸取养分，但又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她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得到升华。

三

宋庆龄迫切希望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她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指出“中国如果要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现代各国的斗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改变半封建的生活情况，并以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代替那存在了一千年以上的中世纪制度。”[1] 而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她的藏书中，另外一个关注的重点便是西方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

在经济理论方面，有 John Stuart 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册）（第二册）（*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Ⅰ][Volume Ⅱ]*，The Colonial Press，1900），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调和折衷主义是公认的穆勒《原理》的特征，它总结了从亚当·斯密起到 19 世纪中叶大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F. W. Taussig《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Volume Ⅱ]*，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Frank William Taussig 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经济学原理》分上下两卷，第一卷主要撰写劳动力、生产、银行和贸易；第二卷他集中撰写了财富的分配、工资、经济中的问题以及税收。Norris A. Brisco《商业经济学》（*Economics Of Business*，The Macmillan Company，1917），John Maynard Keynes《和平带来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 of the Peace*，Harcourt Brace and Howe，1920），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英国经济学家。1919 年，凯恩斯参加了巴黎和会，身份是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他曾试图减少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遭到失败后辞职并撰写了本书。Benson Y. Landis《合作经济》（*A Cooperative Economy*，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43）等，共约 5 种。

在商业的具体运作上，有 Charles W. Gerstenberg《组织与管理》（第三卷）（*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Volume Ⅲ]*，Alexander Hamilton Institute，1917），Pitman《毕德门商业通讯和商业英语》（*Pitman's 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 and Commercial English*，Sir Isaac Pitman & Sons，LTD.，1930），W. Hartley Withers《股

票与股份》（*Stocks And Shares*，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921）等，共约 3 种。

宋庆龄对各国的经济情况也有所关注。如 F. W. Taussig《美国关税史》（*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 series of essays*，G. P. Putnam’s Sons，1905），John A. Bole《德国经济》（*Deutsche Wirtschaft*，Henry Holt and Company，1910），Charles H. Grinling《英国铁路线》（*The Ways Of Our Railways*，Ward，Lock & Co.，Limited，1910），William James Ashley《英国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England*，Longmans，Green And Co.，1914），《苏联经济手册》（*Economic Handbook Of The Soviet Union*，American-Russian Chamber Of Commerce,1931),M. Ilin《苏联的计划经济》（*Moscow Has A Plan*，Jonathan Cape 30 Bedford Square，1932），共约 6 种。

宋庆龄并非经济专业出身，但她的几个弟弟都与经济打交道。这些书可能并非全部由宋庆龄购置，如 John A. Bole《德国经济》一书上有宋子文签名，可能为宋子文购买的书籍。但这并不能否认宋庆龄对经济的关注。她曾积极地帮助工合运动，建国后，不辞辛苦地视察全国各地，对经济建设十分关心。这些藏书不仅反映了她对经济的重视，更寄托了她对亲友的怀念。

四

宋庆龄大学所学的专业是文学，她的藏书中也不乏很多文学名著，但又不仅局限于此。军事、地理、科学、医学、家政，工艺等，在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结构多元、种类繁多的藏书，让她的知识结构也得到很大的扩展。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使得她对自己要求很高。宋庆龄在政治上为国为民，兢兢业业，但这并不妨碍她还是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人。故居的这些藏书就展示了宋庆龄作为伟人走下神坛的一面，也让她更增添了女性的柔美与温情。

宋庆龄她从小接受西式教育，1902 年入中西女塾，1907 年 8 月赴美读书，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就读 5 年后，1913 年 6 月经日本回国。1927 年她因不满国内政治局势远赴苏联，并在德、法两国游历，1929 年又再次去法、德两国，这些海外生活经历，使她对欧美大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状况，有着真切的感性了解。她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语言运用、审美情趣以及行为方式，都能看出深受西方影响。

宋庆龄对英文的熟练程度远胜于中文。在日常的文稿和信件中，她习惯使用的也是英文。因而宋庆龄对阅读西文书籍没有语言和知识基础的障碍。这也是她英文藏书如此丰富的原因。从故居现存的 1949 年以前出版的这些西文书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宋庆龄宏大的世界意识，她对世界潮流、世界发展趋势有着自己的敏感度，当她考虑中国问题时，这些书籍也为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

宋庆龄曾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写到“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2] 这条道路漫长而又艰辛，宋庆龄一生都在为此奋斗。她对国家、人民的爱支撑她一人走过艰难岁月，这些默默守候、陪伴她的图书给了她精神上的抚慰，为她孤独的日子添上了一抹亮丽的颜色。

[1][2]《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49 页，第 3 页。

浅谈金属文物的保护

撰文 / 水草

金属类文物是我馆馆藏文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馆藏有金银器 150 余件，铜器近 100 件，另有铁器、铝器等，金属类文物共计 300 余件。金属文物与其所处环境介质极易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导致各种程度的腐蚀，因此，如何保护好这些金属文物是一个我们需要去研究的课题。

做好预防性保护

目前的文物科技保护理念已经从以抢救性保护修复，被动维修遭损文物，向以预防性调控环境，主动维护防止文物产生劣化转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预防性保护”原则。

环境因素是引发文物损害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湿度、污染气体、光辐射、虫害、霉菌等，这些因素都对文物保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金属类文物当然也不例外。

对金属类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归根结底还是要为文物营造一个“稳定、洁净”的生存环境。要保证这一点，就要做到防火、防水、防光、防尘、防虫、适宜温湿度、通风等。金属类文物易受空气环境及湿度影响，因此对温湿度和腐蚀环境的监测是十分重要的预防性保护措施。现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可以在实质的腐蚀危害到来之前发出提示，提醒文物保管人员对库房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避免文物受损。

总之，现在的文物保护理念就是倡导通过有效的质量管理、监测、评估、调控



▲ EACMS-2000 金属大气腐蚀监测仪

干预，抑制各种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危害作用，努力使文物处于一个“稳定、洁净”的安全生存环境，尽可能阻止或延缓文物的化学性质改变乃至最终劣化，达到长久保存馆藏文物的目的。

发生病害后的治理

当金属和它所处的环境介质之间发生化学、电化学和物理作用而引起变质和破坏，称之为金属文物腐蚀。金属文物腐蚀的病害类型有很多表现形式，包括残缺、裂隙、变形、层状堆积、孔洞、瘤状物、表面硬结物、通体矿化、点腐蚀、缝隙腐蚀、全面腐蚀、腐蚀变色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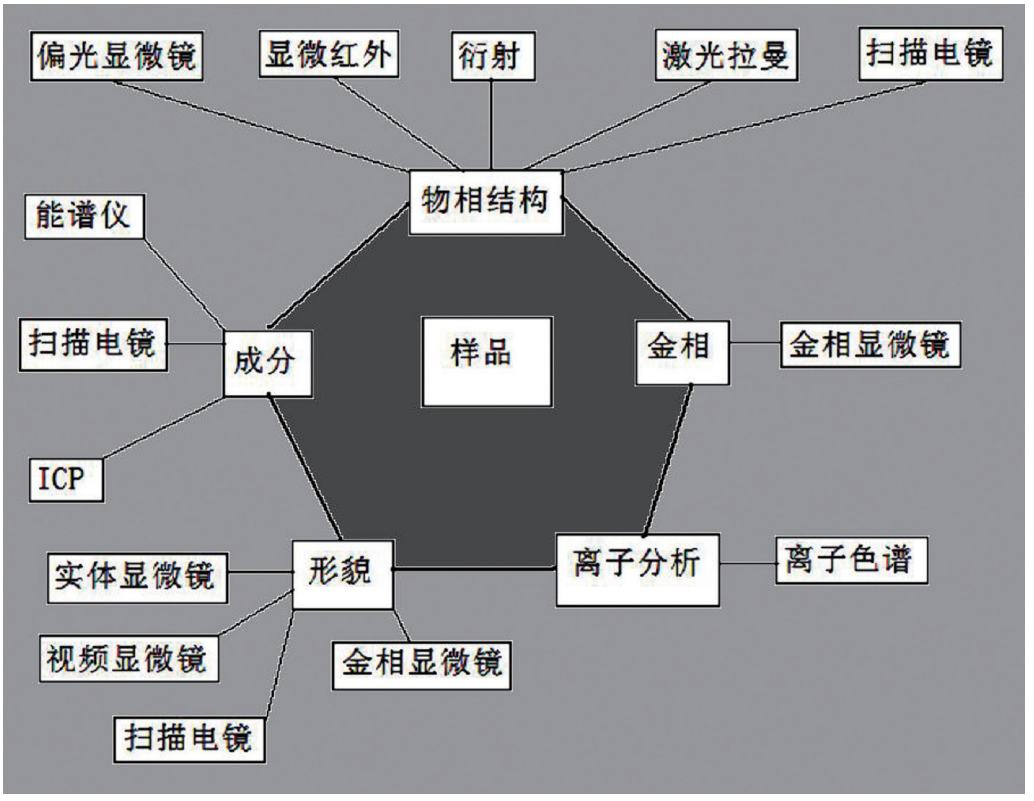
病害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文物的状态进行科学的检测分析，即展开现状调查，建立文物病害程度及其健康状况分析评估体系，建立相关基础资料数据库。

金属文物的科学检测分析手段有很多种，根据病害的严重程度选择其中之一或多种手段。文物的形貌分析可用实体显微镜、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成分分析可用能谱仪、扫描电仪、ICP；物相结构分析可用偏光显微镜、显微红外、激光拉曼、扫描电镜；离子分析可用离子色谱；等等。分析结束后形成检测报告，为后续步骤的依据。

在检测分析完毕之后就进入第二步，编写修复方案。金属文物的修复原则有六条：最小干预原则、保持原状原则、可再处理原则、耐久性原则、兼容性原则、安全性原则。这六条原则是在编写修复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

最小干预原则。对于文物来说，任何修补行为都是一种干预，都会对器物上的原有信息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所以应尽可能少添加人为的因素，不刻意弥补表面的残缺。

保持原状原则。也就是保持文物历史



▲ 金属文物科学检测分析手册

真实性和艺术性原则。任何添加材料不能影响文物的内涵信息和外观，表面封护材料应无色、透明、无明显光泽。

可再处理原则。修复金属文物，无论处理方法还是所用材料都应考虑到可重复操作性，即修补部位易于拆除，修复材料能够更换，尽可能不影响以后的修复保护工作。

耐久性原则。修补材料本身应具有良好的耐老化性能，并能与器物原有材质长期稳定相处。

兼容性原则。修补材料应与器物原有材料在化学属性上尽量相近，不能因为修补材料改变或破坏原制作材料。

安全性原则。处理过程不应对器物和操作人员有任何伤害。应尽量选择无毒或低毒材料或试剂，并有必要的安全措施。

在进行了检测分析，制定了修复方案之后，就是着手实施保护修复处理的阶段了。一般包括有除锈、清理、预加固、去除氯化物、缓蚀处理、粘接修补、表面封护、表面修复等步骤。保护修复处理的过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最后是否能把腐蚀病害去除或减轻取决于之前的分析是否准确，方案是否对症，操作是否得当。

几类金属文物的保护处理技术简介

铁　器

铁器的最主要病害表现是锈蚀。针对铁器的保护处理技术有：除锈及脱盐清洗方法、化学稳定保护处理方法、表面封护处理方法、加固渗透处理方法。

除锈及脱盐清洗方法又包括机械除锈法、化学除锈法、电解还原除锈法、索格利特萃取法、碱性溶液脱盐清洗法、激光清洗法。表面封护处理方法包括防锈蜡封护、有机高分子树脂材料封护。

一般保护处理铁器的工作流程是，处理前分析——除锈——脱盐——缓蚀——封护——加固——修复。

铜　器

铜器的保护处理技术有：倍半碳酸钠浸泡法、氧化银局部封闭法、超声波清洗、BTA 缓蚀保护处理法、罗歇尔盐处理法、碱性甘油去锈、有机高分子材料封护法。

银　器

银器占我馆馆藏金属类文物很大比重，腐蚀变色是其主要病害表现。针对银器的保护处理技术有：物理除锈法、化学除锈法、缓蚀剂保护处理法、有机高分子材料封护法。因操作方便，物理除锈法是我们平时采用比较多的方法，一般使用擦银布，用力摩擦器物表面，银器就会恢复光亮。但这种方法并不推荐使用，因为摩擦掉腐蚀层的同时也是在磨损器物本身的材质。相对的，化学除锈法是效果好又不伤害文物本身的，缺点就是操作过程比较繁琐，且需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因我馆馆藏文物基本都属于革命文物，制造年代并不久远，加之保护得当，目前金属类文物的腐蚀病害问题并不突出。基于最小干预原则，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进行人为的修复处理，更为重要的是要继续做好预防性保护。将来，在软硬件齐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运用先进的环境实时监控技术，建立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平台，引进环境调控材料和装置，提升文物保存环境质量调控水平，从而更好地保护金属文物。

谈馆藏书画文物的保护

撰文 / 徐建华

文物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有文物的收藏，就必然面临文物保护这样一个课题。

在我国各类博物馆纪念馆都有收藏大量的纸质类文物，包括书画文物，它既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了使这些珍贵的书画文物能够完全妥善地得到保护，不因为我们的疏忽，以及保管工作的随意性使其遭到损坏，就需要加强管理，加强研究，不断探索保护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改进保护管理方法，进而采取正确有效的保护保养措施，使之不断地发挥它的社会价值。

书画文物的保护原则

故居纪念馆保存有宋庆龄许多纸质类文物包括书画文物，它们基本保存完好。但因为结构和材料的关系，在长期的保存当中有些书画我们发现会出现发霉、发黄、脆裂、斑点、颜色变浅等一些情况。但归纳起来不外两个因素：一个是书画制成材料的特性，这是书画遭到损坏的内在因素；另一个是书画保管条件，例如：温度与湿度、光的辐射、有害气体和灰尘、霉菌等等，这是损坏书画的外在因素，针对书画由于内因和外因引起的损坏，就需要依靠传统的保护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加以保护。为此，要研究书画的材料成分，了解其量变、质变过程，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阻止或延缓书画的变化。我们应注意掌握这样的原则：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书画文物的保护采取科学管理，防止书画文物持续损坏，预防为主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防”，这在科学的保管书画的技术方法中是个根本问题，是保管好书画的最积极的措施。控制好书画的存放环境，使文物的变化降到最低限度是保管的基本要求。目前在故居纪念馆收藏的书画文物中大多没有损坏，我们应当以极大的注意力来保护这些没有损坏的书画文物的安全。为书画文物的保管创造适应的条件，不使其遭受各种有害因素的损坏才能减少“治”的压力。

对已经发生损坏的书画文物要及时进行干预，采取措施，以防文物状况进一步恶化。

书画文物的制成材料主要以纸张、丝织品、矿物质颜料和墨为主，不管其制成材料的耐损程度如何，它的“寿命”总是有限的，不是永远不会损坏的。所以在“防”

和“治”这两个方面，防是主要的。但是也不能丝毫疏忽“治”。这是保护书画文物的技术方法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在研究保护书画的技术方法中，应当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书画文物的保护环境

1. 温湿度与书画文物的保护关系

书画文物需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就像生物离开温度和湿度就不能生存一样。适宜的温度湿度对纸张、丝织品、颜料、墨色的耐久性都有益，不适宜的温度对书画有多方面的破坏作用。温度高不仅加速纤维质地文物老化，降低它的强度，而且能够加快化学纸浆的分解和木质素的化学变化。在湿度正常的情况下，库房内温度过高，纸张中原有的水分蒸发，书画就干燥变脆。库房内温度忽高忽低时，一方面可使湿度过大或过于干燥，另一方面书画纸张纤维因热胀冷缩易使纸张强度降低。

湿度过大时，库房书画容易生霉和使其他有害细菌繁殖。霉菌和细菌，尤其是霉菌，对书画文物的破坏非常大。湿度忽高忽低时，同样会让纸张纤维遇湿膨胀，干燥收缩，使纸张强度收到影响。

高温度会给书画带来更大的损坏作用。它会给纸张中的有害化学杂质创造破坏纸张纤维的条件，因为这些杂质在高的温、湿度条件下破坏作用就更大。

总的来说不适宜的温度和湿度给书画带来的危害很大。因此，库房内的温湿度应尽可能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以维护书画文物的安全与完整。纪念馆保管书画文物最适宜的温度是 14℃ — 18℃，最适宜的相对湿度是 50%—60%。在一昼夜以内温度容许变化范围是 2℃，湿度容许变化的范围是 3%，这样的温湿度对延长书画文物“寿命”是有利的。

2. 光线与书画文物保护的关系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一件织物长期处于阳光的照射下，时间长了经常处于光照的一面与未照的一面在色泽上发生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光能改变颜色并使物体表面变质，而表面正是书画的精华之所在。

光线由于光源的不同分为自然光（太阳光）和人工光（各种电灯）。不管是自然光或人工光对书画文物都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而其中破坏作用最大的是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纸对紫外线辐射尤为敏感，对书画的损害很大。

除太阳光外，来自人工光的辐射，对书画文物同样也有破坏作用。一般常用的白炽灯、日光灯，其中的紫外线虽然大多被灯泡和灯管所吸收，但仍然对书画产生破坏作用。若光线不强烈，危害尚轻，光线愈强，则破坏性愈大。

因此可以判定，光对书画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情况在文物库房当中应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书画的存放也都置于箱、柜中，受到光线照射时间要少的多。问题是书画在展览陈列过程中，无一例外要受光线的长时间辐射，既要将书画陈列展示给观众，予以欣赏，又不愿使其受到光的损害，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关键在实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有些高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纪念馆在书画展厅，采用观众移动步幅沿展线持续前行时，灯光会渐渐由亮到暗，整个展厅照明完全靠照度较弱的顶灯工作，对展柜中书画不产生任何影响。

3. 空气与书画的保护关系

空气污染是环境保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空气中含有的灰尘和各种有害气体，不仅对人类健康有直接的影响，同样对书画文物有害而无益。灰尘对书画的危害，灰尘落到书画上使纸张颜色变灰，影响到书画的感观效果。灰尘是微生物寄生与繁殖的掩护所，也是各种霉菌的传播者。许

（下转 59 页）

受一次培训 沐十里春风

——参加藏品管理与信息化培训班感悟

撰文 / 花婆婆

2011 年 4 月，我接到单位通知，和部门副主任宫洁菁一起参加了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市宣传系统人才交流中心组织的藏品管理与信息化培训班。虽然是文博专业出身，又在基层工作了几年，在实践中还总是深感知识不足，这次培训班为我提供了一个更新知识，拓宽视野的极好机会，我觉得收获很大。

4 月 20 日，我来到复旦新闻学院综合楼报到，开始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班上我们遇到了很多同行，大家互相交流彼此的经验。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上海市文物局博物馆管理处处长郑亚，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副主任邓贺鹰出席了开班仪式并讲话。在第一堂课上国家文物局信息部主任祝孔强介绍了文物信息化与文物调查项目，这一项目的重点在数据采集工作上，现已采集 1660，275 件，可见国家文物信息化的成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委员会会长、首都博物馆的祁庆国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文物影像认识与采集课。因为编辑馆刊的原因，我对文物影像有一些关注。由于设备和经验的缺乏，以往在拍摄文物时总要重复拍摄多次，要达到理想的效果更多地需要后期处理。祁老师展示了许多精美的文物图片，告诉我们怎样的文物影像才是比较理想的。他说在拍摄文物之前，要依据对文物的理解与认识，脑中有一个对文物的想象，从而确定拍摄方案。我们都知道文物影像首先要表现外观特性（器型、质地、色彩、纹饰等），其次要表现美感，表现出历史韵味、文化韵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并非容易，需要掌握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

其一就是文物的摆放要符合功能和使用的历史环境，要摆正，不可偏一侧，纹饰也要完整。祁老师举了几个例子，像戈的外凸起摆放在上，横放于背景纸上，平刃在下；铁斧应刃朝下摆放，稍侧看出厚度即可等等。这些以前看照片的时候还真的没有很在意，现在发现这些细节处处体现着学问。为了便于我们操作，祁老师将文物形状大致分为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球体、半球体、圆锥体等几样。告诉我们不同形状文物的最佳拍摄角度。像长方形的文物略侧一些拍摄，就能表现出一边比另一边长的感觉，而不会形成正方形的错觉；正方体则最好在正稍左侧拍摄；圆柱体要放在正方上侧拍；竖长文物不能太高角度拍，因为高角度拍摄会显得物体扁，低角度与原物更接近；拍摄盘形

如铜镜类的文物，相机一定要与器物垂直，俯拍或者直立，这样得到文物的正投影信息最为全面；建筑在右上侧拍摄。虽然古代文物可能与我们故居的有区别，但是因为文物摄影存在一些规律性问题，可以触类旁通，对馆内文物的拍摄也很有启发。

其二就是关于文物摄影的灯光。以前我们大多都是借助自然光拍摄，效果很难把握，听课后知道了文物拍摄时至少应有三个灯，主灯最强，顶光灯把主体与背景分离开来，侧后方再打一个辅灯。瓷器拍摄容易产生光斑，我们以前一期馆刊有选录过一些瓷器，当时摄影产生的光斑让我很头疼，祈老师说这些光斑不用全部消掉，可以适当保留，如果很严重，可以涂消斑剂。现在高度自动化的数字照相机，使拍摄（不是摄影）变得简单了，但是要注意这仅仅是拍摄操作变得简单了，而不是摄影变得简单了，重要的是人，不是设备。后来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祈老师还专门在隔壁临时搭建了一个摄影棚，并向我们展示了具体拍摄的手法。相机连着数字后背，拍摄好的图像直接在电脑上显示出来，如果效果不好马上可以调整灯光或位置重新拍摄，直到得到满意的图像。这样拍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拍摄效率，改善了拍摄效果，虽然现在我们的硬件条件还达不到，但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以前文物摄影中遇到的问题，碰到的困惑，在听了祁老师的课后，心里慢慢有了答案，文物摄影要做的好还需要经过不断的经验累积，但知识的储备将为我们打下一个好一点的基础。

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上海博物馆原保管部主任黄福康老师的讲课。黄老师非常认真严谨，在保管岗位上做了多年，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前辈。他经历了上博库房几次搬迁，经验非常丰富。他对库房建设有着很深的体会，因上海博物馆库房一部分在地下室，他觉得很不满意，觉得弊病很多，因为一旦发生渗水问题很难解决。他告诉我们库房不宜在顶层，也不宜在地下室，最好在中间。库房建设时最好设双走廊，这样空气有个渐变。库房内的窗户装双层磨砂玻璃，可以过滤40%的紫外线。因为灰尘有吸水性和传播霉菌的特点，库房入口要设置风淋，吹一下灰尘，且门窗和柜子都应有好的密封效果。文物进库前要消毒熏蒸，以防止虫害。本着防火的要求，库房内不能有电源插座。库房内使用的柜子用木制上油漆的较好，柜中不要放药丸，这些药丸对人体伤害都很大。为了方便管理，库房内的橱子最好不上锁。柜子最好背靠背，或靠墙放，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意外损坏。从防光的角度考虑，文物最好有窗帘、文物柜、囊匣、布套四层保护，文物要保存在无光的环境下，因而走廊照明最好在150lx，不能超过200lx。黄老师说的这些要求我们现在有些还达不到，但是等到库房搬迁后，相信我们的文物也会有一个安全宽敞、整洁有序的“家”了。

复旦文博系的陈红京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在这次培训中，他为我们介绍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芯片在库房的应用，这一技术已在复旦大学博物馆库房得以使用。这种方式可以快速得到文物的基本信息，统计在库的藏品数量。我看了很受触动，虽然这个标签有一些弊端，但是一旦使用，我相信将给藏品保管效率带来质的飞跃。

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老师讲授的一套完善的征集方法让我很受启发。众所周知，鲁迅纪念馆的征集工作非常出色，他们视野开阔，文物征集不仅仅局限于鲁迅及其亲友，只要是近代历史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都有涉猎。王馆长向我们传授了许多有用的招数。他说征集应把握好目的性、整体性和计划性这些基本原则。通过现状调查，摸清藏品现状，弄清目前藏品的缺

陷与缺口。看看预期的征集任务与现有任务的配合度，如果现在不行，那么就要研究发展趋势标示的预期与拓展的可能性。案头工作也要做好，当前征集对象的状况，预期文物，远期文物都要登记在案，通过常扫描、常交流、常梳理等工作发现更多的征集线索。从这些就可以看出鲁迅纪念馆的征集工作非常有规划性、预见性，他们注重发展，避免偏科，对策预设严密覆盖，十分严谨科学。他们设专人负责征集工作，是定人定责制。征集员平常不用坐班，经常在外面跑，馆领导给予他们极大的信任，可谓配备了最大可能的人力和财力布局。在多年的征集工作中，王馆长总结了一套流程：发现（问题，缺口，目标）——锁定目标——跟踪（外围调查，逐步接近）——接触（鉴定）——交流（感情投资）——公关（正面接触，谈判）——决策（价值衡量、资金）——手续——回馈。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经让鲁迅征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位日本人对中国近代历史很感兴趣，颇多这方面的收藏。鲁迅纪念馆经过了解，发现有一份关于甲午中日海战的文物非常重要，他们很想征集。通过不断的沟通，鲁迅纪念馆得知这位先生很想用自己的藏品办一个展览。但是由于政治敏感性很强，在中国很难操作，后来鲁迅纪念馆想法设法，回避了这些敏感问题，从鲁迅和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让这一展品走向了观众。在展览结束时，他们又从行政角度劝说，说明这批展品入境容易，出境困难重重，情感投资加循循劝诱，最终将想要的文物纳入囊中。这些经验虽说我们以前也有些感悟，但是没有这么系统，通过这么一番梳理，让我觉得故居的征集工作还是大有可为的。

这次培训上有很多专业性极强的课程，像金属文物保护技术，有机质文物保护技术，文物预防性保护与博物馆环境监控技术，讲课的老师都是理科出身，其中不乏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我们认真做了笔记，回头还要认真地把这些知识消化一下。这是自己迈出校门以后第一次系统的充电，希望以后可以多一些这样的机会。

（上接 56 页）
多书画的损坏和发霉都是与灰尘传播有直接关系。有的灰尘带有强烈的腐蚀性，破坏书画。

书画库房的除尘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工业城市或设备较差的库房、展厅灰尘的危害严重。如能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如库房、展厅的门窗、展示柜加装密封条，利用相关设备对空气过滤等，这对书画文物“寿命”的延长会有很大的好处。为了减少有害气体对书画的损害，最主要的是注意文物库房的选址。另外将书画文物保存在密封的箱柜或囊匣内，也能有效地防止一些有害气体的破坏作用。

不管是传统技术，还是新技术、新材料，应用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文物，保护文物的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正确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该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一个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使书画文物的保护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

随着故居纪念馆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新库房已经建成，书画文物的保存环境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只要我们在研究保护书画文物的技术方法中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就能保护延长书画文物的寿命，不断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个人的历史》选译（连载）

著 / 文森特 · 希恩　译 / 郑培燕

16

我们不难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暗示着俄国群众的强大力量和命运，将是如何让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如斯大林）豪情万丈、不断膨胀的。想到这十年来的拼死斗争，那些站对立场的人觉得这次周年纪念是完全胜利的。但是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也很难忘记斯大林一年半以来都不敢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引导了1917年11月7日运动的天才革命人物，言论受到钳制，被牵制；跟他一起的整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集团，其中有一些最好的作家和演说家，受到抑制或是将要受到抑制；世界革命被遗弃，苏维埃的事实上的专政，并不存在于无产阶级甚至是共产主义政党，而是存在于被称为政治局的小团体。这些想法那天在莫斯科广为流传；我决不是那天在红场上的数十万人中唯一一个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如果托洛茨基被单独拥上列宁墓的上方，接受他们一起表达的革命的敬意，他不会变得比他缺席的时候更显眼。整齐有序的行进者在我看来是按命令例行公事地欢呼着，我没有感觉到这些群众是充满真正狂热的激情——就像我偶尔在中国感觉到的那样。有太多的谣言在传播，太多晦涩的传说，太多因绝望而产生的推测。大多数恰好出现的这些都不是真的，但却有它们的影响。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到红场，旗帜上张贴着传统的标语，突然，当他们经过斯大林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剩余人员前面的时候，将旗子打开，标语的内容是："托洛茨基万岁！"他们被逮捕并被带走了。（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我的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说是，当然有一些骚乱，但是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加米涅夫已经被流放了；托洛茨基被杀掉了；托洛茨基没有被杀掉；越飞自杀了，还是试图自杀，还是在克里姆林医院被拒绝医疗护理……共产国际被改组了，还是将要被改组，武装被解除，收益被缩减；将来所有能源都只用在苏联；将要出现向帝国主义的进一步倒退；苏维埃代表大会也随之一起退步，苏联"宪法"成为过去，除了那个确定的小团体政治局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

那天我们在红场一直待到5点钟，到那个时候，连雷娜想要好好利用这场集会的决心也有点减弱了。但她不同意我认为这次集会缺乏精神的观点，不过，她的确突然忧郁地说："它跟中国的一点都不一样。如果你看过广东的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了！"

我们穿过人群去大都会饭店看望我的前"亲戚"，法尼娅·鲍罗廷。她几天前

到了莫斯科，在这个下午她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似乎因为这壮观的场面而热情高涨的人。她朝着广场上方的窗子做着手势，欣喜若狂地双手紧握，说道：

“这太好了！太好了！想到我们为之奋斗了多少年，就好像一个美丽的梦一样！”

我们到楼下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起吃饭，她是跟鲍罗廷一起从蒙古来的，还写了一本关于那十三天的书；之后我们在街上漫步一直走到华尔特·杜朗梯（Walter Duranty）[1]的住所。那里有位英国工党下议院议员弗兰克·韦斯（Frank Wise，已故），他很幽默，那个晚上就这么愉快地度过了。但是那一天和之后的日子我被模糊的、不祥的预感所困扰。它们并不正确（是什么不祥的预感？），但是跟确实发生的事情却很接近，很容易设想会意味着什么——即使离现在已经那么久了。从那第一天之后，我就积极地不顾一切要阻止雷娜加入共产党。

在那个时期的所有矛盾中，这也许是最严重的。发出如此光和热的纯净的火焰——是什么呢？我被吸引朝着它去的中心，我看到的世界的焦点，是作为革命者的雷娜·普罗梅：不单单是革命，也不单单是雷娜·普罗梅，而是因信念而发热并与信念结为一体的雷娜·普罗梅。实际上，这是我来莫斯科的原因。可是从到达莫斯科那一刻起，我拼命想让她从她理想的中心离开——将她唤回我想要继续生活的那半个世界——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用——“不顾一切”，“拼命”——这样强烈的词语，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两个词语所表达的意思，甚至更强烈。六天六夜，这种努力几乎没有间断过。她的房间在我起居室的另外一边，在隔壁的公寓里，我们当中谁想到了新的论点谁就敲敲墙壁；两分钟后——拿走胆小的房东放置的数不清的铁的、钢的、木头的路障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又见面开始另一轮的辩论。我们有时一直谈到早上四五点钟，辩论永远都会更新，永远没有结束。我们两个都睡得不多，但是我壮得像头牛，也没有意识到这样过度的疲劳对她的神经系统产生了怎样糟糕的影响。不论之后我如何痛苦得后悔莫及，有一件事是事实。当我感觉到她身体比以前更虚弱的时候，我还用它作为论据。她有严重的头疼已经好几个月了，最近更频繁；阿司匹林和非那西汀都不管用；有时在争论的过程中，她会眼睛发花，会说：“等一会。我得安静一会；又头疼了。”头疼过去后，我常常问她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怎么能承受作为一个革命者生活的困苦。这一论据没有任何作用。她会笑着说：“不论是身处革命中还是革命外，我都会在某个时候死去，有什么关系呢？”她完全不顾及个人的命运，我想不出任何事情能对她产生影响。确实对她产生作用的论点是那些总体的观点，那些针对革命本身的观点；这些当中最有效的一个是我在伦敦所遇到的——如凯恩斯（J.M.Keynes）[2]在他最近的小册子中所表露的，关于俄国的观点。我拍电报到伦敦索要那本小册子，不过没有到。

主张所有这一切里面没有任何自私和个人的东西是很愚蠢的。其实是有的。我已经说过，我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如果没有从这特别的火焰散发出的光和热，我就活不了。9月份我对此毫不怀疑；我可能会追随她去列宁学院，去共产党，去韩国，去日本或任何地方。十月份，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也很清楚地看到我对这种生活准备得并不充分。11月我不再愿意追随她，即使是在思想上也不愿意，相反，我竭力将她从那种确信中拉回来，到一个更容易生存的世界，那里男人们不再为了信仰而死——那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信仰，如果人们能有办法的话。这一

努力是自私的，也是个人的，首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感觉之上的，即雷娜·普罗梅作为一个完全的革命机器（在一年的时间里），对我最近重新发现的懒惰的中产阶级是陌生的。她将不再属于我和我的世界：从一个中产阶级个人的意义上来说，她将完全迷失，因为她的目的，即使对于一个共产党人，也太极端了。

她已经决定入党，并进入列宁学院受训成为完全的革命机器。完成学习之后她要服务于一个革命组织，也许开始是太平洋劳工局，之后也许是共产国际的直接工作。她特别的条件加上她自己的愿望，可能被派往远东。

生命中没有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决定了。修女的誓言，婚姻的誓约，军人挑战的决心，都不像这个决定一样具有这种无可挽回的特性。雷娜不是随便做这样的决定的；她已经与革命工作亲密接触了四年，知道她在干什么。关于工作的性质或它的影响我举不出任何论据能让她有丝毫的改变，因为我发现她之前早已考虑过了。

例如，我们知道某些为共产国际服务的人在逃跑时被迫采用各种权宜之计，保护东方的革命组织。我毫不留情地强调这一点。

“你准备说谎、伪造护照、更名换姓甚至假装不属于你为之工作的党吗？”

这类事情最能影响雷娜的信心，因为她是率直公正的化身。

“如果绝对需要那么做的话我全都会去做，”她会坚定地回答。“我不认为那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必须的、明智可取的。但是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取决于它，我说谎又有什么关系呢？除了我思想的安宁外不会伤害到别的任何事情，我思想的安宁不重要。”

“你准备服从指示，即使当你觉得它们绝对是错误的也服从吗？”

“当然。如果不是觉得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们比我懂得更多革命技巧，我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一次又一次，我转为最简单，最无力的辩论——抨击革命者的情感特质，抨击雷娜的个人情况。

“当然，事实是，”我会说：“你从作为一名革命工作者的想法中获得一种个人的刺激。这是彻底的浪漫主义。远比回到芝加哥的家中听交响音乐更让人激动！那就是事实。革命的主张正确与否并不重要：你必须寻求你的刺激。”

我从没说过类似的话而没有立刻意识到那是多么似是而非，粗俗不堪；但是当我用尽我所能想到的所有合理论据之后，胡乱的尝试就成为剩下的唯一形式。雷娜，碰巧对这个过程理解得太透彻了，因而丝毫不受干扰：她知道这种话是软弱、思维枯竭的表现，无论她自己如何疲倦，她从没有停止欢笑。那笑声常常伴随着礼貌的告诫，用了一点小小的智慧，是这样的：

“吉米，不要做让人讨厌的傻瓜。”

在过了整整七年之后，这条建议感觉还是那么清晰，那么近，就好像是十分钟前说的一样。我不假装去始终如一地按这一条行事，甚至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但是在某些重要时刻，思想上毫无准备的时候，它会冲破周围的环境，在我的耳畔响起，那语气、重音、笑声以及一切，像是真实的声音。

那个星期就在紧张的，毫无结果的辩论中度过了，我得仔细探究才能发现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别的人，美国人——安娜·路易斯，路易斯·菲舍尔和多萝西·汤普森，是那个星期来莫斯科的——还有中国人。鲍罗廷很忙碌也很担忧，我只见过他两三次。

孙夫人因为一种让人遗憾的情况而与雷娜疏远了，这件事有必要记录下来，我好几天没看见她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新闻，——十

月的某时孙夫人要和陈友仁结婚，苏联政府以让他们在克里米亚度蜜月作为新婚礼物。这个传言，只要是对所涉及的人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会觉得很无聊，却让雷娜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她要么冒着使孙夫人精神崩溃的危险而告诉她，要么不告诉她而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陈先生，一听说此事，就要求雷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告诉孙夫人。因为她表面上还是为共产国际工作，直接对陈负责（即便是没有薪水的），她服从了陈的指示。结果是，孙夫人结束克里米亚两周的休息回来，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匆匆忙忙的美国朋友，祝贺她即将与陈的结合。

她到莫斯科的时候处于崩溃的状态，卧床不起。为了她所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为了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她的精神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为了那个理想她已经牺牲了任何中国妇女都珍视的东西。到头来，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整个世界将她这次莫斯科之行看成是一场庸俗的、无关紧要的私奔——而且是跟一个混血的男人，她跟他的联系完全只是政治上的——这对她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病了三个礼拜，那时候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拒绝见朋友。就在她病情开始有所好转的时候，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也是通过报纸：她的小妹美龄在上海结婚了，披着“社交婚姻”的一切表象和荒唐跟文盲蒋介石结婚了。没有什么比这对她的伤害更大了。她的勇气和尊严无与伦比，但她的身体却不是这样坚强。在这些充满阴霾的日子里，她无法下床，似乎雷娜，也缺乏忠诚——雷娜应该立刻告诉她《纽约时报》上的故事并跟她一起面对。雷娜的忠诚，在所有事情上都是绝对的，甚至不允许她告诉孙夫人是陈友仁不让她说的。

这是汉口流亡者小群体的情况，他们有不合，雷娜的实际工作——除了协助鲍罗廷准备一份报告之外——不得不停了下来。不能再每日陪伴孙夫人，她越来越多转向中国和俄国共产党，在他们中间，她有忠实的朋友，他们自然不会在她正在做出的伟大决定前面设置障碍。这一切都是在我 11 月 7 日到达莫斯科之前发生的，尽管雷娜做出勇敢努力超越个人的一些考虑， 也确实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做得都好，她所生活的境遇并没有延缓，甚至是加速了她正一步步接近的、献身为祭品的进程。

我不想夸大或概括那时我所感受到的，弥漫在莫斯科令人阴郁的不安。很有可能其他的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知道肯定是这样的。一天多萝西·汤普森带我跟一位外国大使夫人一起喝茶，我们的谈话——除了一些关于葬礼和暗杀等小话题之外——是很轻松的。多萝西自己很愉快；在莫斯科的大多数记者跟其它地方的都是一样的；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好市民当中周年庆祝也不乏欢乐的气氛。莫斯科的街道并没有比别的街道阴郁，外国来的一些代表团中有一种看得出来的热情，一种希望的氛围。但是所有这些外部的情况都让位给了我所热衷的那热烈而致命的争论。在这样的思想构架里，因忧虑而悲观，因恐惧而沮丧，要挽救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的愿望让我极度不安，莫斯科弥漫的所有不祥的谣言激起了我的各种想象，并演变成我对中心问题越来越多的恐惧。这些传言中有数不清关于共产主义反对党命运的说法，关于共产国际和外国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将何去何从）的模糊推测，还有，——也许是最阴郁的一个传言——越飞的病和死（或者是自杀），是他最早建立了苏联和孙中山之间的联合。那个星期一天一天在过去，我越来越多在伏特加中寻求慰藉，因为在我看来，某种激烈的冲击必然将终结这种紧张的状态，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而结果如何是不能准确预见的。我预见的结局是

雷娜肯定要加入共产党并进入列宁学院，对这件事——我用尽一切努力都无法拖延的事——在那些天里，我给它取了个名字，“雷娜·普罗梅的结局”。

11 月 11 日，星期五，我们几乎一个晚上都在辩论。那是最后的辩论。在辩论的最后，当问题的每个方面，个人的、总体的，都已经被讨论过无数遍，雷娜的决心仍然毫不动摇，我们互道再见——当然，不是很严肃的；雷娜的情绪里总是有一些轻快的东西；她总是能够笑，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候也是。这告别如果不是立刻就出现了，我简直无法解释这是什么样的告别。我们本来第二天要再见面的，但是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也是告别。她下周一要去列宁学院，我也要尽快离开莫斯科。我要求她为我做一件小事（我也不知道我希望通过它来证明什么），就是让她第二天晚上穿上从中国带来的，宋庆龄送给她的金色衣服，戴上比尔给她的琥珀项链，在莫斯科最臭名昭著的奢侈之地，莫斯科夫斯卡亚的大饭店与我一起共进晚餐。这当然是在五年计划之前，大都会饭店还没有变成它后来的样子：为外国人服务的豪华设施。那时莫斯科最资产阶级的地方就是古老的大饭店，大多数外国游客都住在那里。我到了莫斯科之后，在那整个一星期的辩论中，雷娜都穿着同一件衣服：一件中式的绿色丝质棉袄，是她所拥有的最暖和的一件了。我们要么在大都会饭店下面很便宜的咖啡馆吃饭，要么在工人合作社，在那里我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吃饭，因为我们两个都没钱。我想给自己要一个“资产阶级之夜”，只为了享受它的乐趣，看她再一次穿那件金色的衣服；不过很可能我还希望（当然，很愚蠢的行为）丝绸和鲜花，音乐和南部来的白葡萄酒，能够实现我没有做成的事情，能够把她带回到她所出生的、现在永远放弃的那个世界。

“好吧，”雷娜说道，“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穿那件金色的衣服，我会冻死的，不过如果我能借到一件外套，我们出去走到街上的时候我拼命跑，我会的。你会拥有你的资产阶级之夜，不过那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第二天，（11 月 12 日，星期六），她去莫斯科夫斯卡亚看望多萝西·汤普森，在多萝西房间里昏倒了。这似乎是个预警，但是到了那天晚上就被忘记了。

“我今晚感觉好极了，”她说，“我那么昏过去好傻，不过我现在感觉比这些天好多了。我想我要享受这资产阶级之夜。”

她看上去——正如她说的——高贵。她只是个瘦弱的女孩子，没有特别的身材或是外形，或是传统上说的那种美，但是她的外表总是因为她那表情丰富的眼睛和她头发的光泽而变得明亮。穿上那件中国带来的金色衣服，那红－棕－金色的短短的卷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支点亮的蜡烛。那件衣服剪裁合体，满族的风格，有领，以一般的丝绸制成，颜色是暗金色。我只见过一次，那是 9 月的一个晚上，孙夫人带我们去大戏院看《红罂粟》。

我们去莫斯科夫斯卡亚度过我们的资产阶级之夜。我们还跳了舞——两次。多萝西·汤普森来了跟我们坐在一起，我告诉她正在发生的事。她似乎有点震惊并表示怀疑。

“你能理解这是什么吗？”我说。“是雷娜·普罗梅的终结。不再有雷娜。都结束了。革命机器 257849 号。”

我所说的话在那时无法让人平静地接受，我转向雷娜，敲敲她中式衣服下瘦瘦的肩膀。

“雷娜·普罗梅的终结，”我说，“雷娜·普罗梅的终结。”

她移开肩膀，转过头，大笑。

“这甚至是革命机器某某号的终结，”她说，“如果你不停止打我的话。总之，

你觉得我是什么做的啊？”

那顿晚餐、金色的衣服、对决定的确信不疑、莫斯科的阴郁、纳帕雷乌利葡萄酒和伏特加，那晚，所有这些，一起摧毁了我的常识。即使我不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我经常说：“雷娜·普罗梅的终结。”那晚似乎就像死亡本身一样是结局性的。

过了一会，雷娜跟我提交换条件。

“我已经同意了资产阶级之夜，”她说，“我已经实行了，金色的衣服，还有所有这些。现在，你不认为我们可以结束了去参加大会吗？他们今晚给外国布尔什维克授勋，我想去看。”

我们出来去了苏联之友大会。是在莫斯科古老的贵族礼堂里举行，那是个大理石宫殿，曾经是用来为托尔斯泰贵族的绅士和淑女们举行盛大的娱乐活动的。现在巨大的台阶上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舞厅本身，就像最大的剧院那么大，满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大理石墙上是一行行巨大的标语，横跨舞厅的是红底金字，以各种语言写成的：“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讲台上，红军的领袖伏罗希洛夫，正在一群俄国和外国代表中间讲话，我们走到一个走廊上站好位置的时候，他正要将红旗爵士勋章发给年迈的德国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3]。

蔡特金、法国人雅克·萨杜尔（Jacques Sadoul）和匈牙利人库恩·贝拉（Bela Kun），是这一重要时刻的英雄。蔡特金的外表（那天晚上即使在我看来）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这位老妇一生都用在了革命斗争上，她感谢伏罗希洛夫颁给她绶带的时候，嘶哑的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颤抖。库恩·贝拉将那里数千人的激情掀到了极点。他是欧洲唯一一位曾经成功创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布尔什维克，即使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他走向伏罗希洛夫受勋的时候人群嘶哑地大声叫喊。

我正站在一个回廊里，站在雷娜旁边，这时发生了下面的事情：人群的咆哮声向我们传过来，一阵接着一阵，像不规则的雷声，她抬头看向我，我能看到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拼命想找到最有力的论据却只发现一件事：

“那个小个子看上去很滑稽，站在伏罗希洛夫边上的那个，不是吗？”

（伏罗希洛夫又高又瘦，库恩·贝拉又矮又胖。）

“哦，该死！”雷娜说道，不耐烦地擦了擦眼睛。“你难道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我确实感觉到了，但我并不想；最重要的是她所感觉到的热情，在那个时刻，几乎让我发疯。我离开了贵族礼堂去喝伏特加。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雷娜和罗易同志相谈正欢，罗易同志是共产国际远东地区的负责人。我在大厅里转悠了一会，再看到她时，只见她被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围着。最后我离开了，回到了莫斯科夫斯卡亚，把我能喝的伏特加全喝完了。我回到莫斯科夫斯卡亚房子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第二天（11 月 13 日，星期天），我睡到很晚，下午，我慢慢走到大都会饭店去看雷娜是不是在那里。我走上宾馆楼梯的时候，就在差不多两个月前的那个晚上碰到雷娜的地方，我遇到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一个小个子中国共产党叫章克。雷娜 1926 年的时候在北平将他藏在自家的地下室里救了他一命，他对她很忠实。

“普罗梅女士病得很重，”章克用平静的，不带丝毫情绪的声音说道。

“她在欧洲旅馆，”安娜·路易斯说，“她显然是昏迷了。章克来找我。我们要把她带回来，让她在我的房间里待一阵子。”

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欧洲旅馆，大约离大都会饭店半个街区的一个小旅馆。章克

带着我们上了楼梯，来到了一个小房间，是中国劳工代表团住的那一部分的接待室。一两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那儿，雷娜昏迷地躺在一个沙发上。

我扶她起来，背她下楼。穿过街道，她轻飘飘的；就像背了个孩子。她曾经醒来过一次，也能说话，问我她是不是很重，还试图站起来。街上的人们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就各自走路。我们迅速到了大都会，在那儿雷娜醒了过来，扶她坐起来，她为自己的昏迷向我们道歉。但在我们达到顶楼安娜·路易斯的房间之前，她又昏迷了。

我把她留在了那里，在安娜·路易斯的床上，下楼去见鲍罗廷。他不在，但我见到了鲍罗廷夫人。

“我知道这种事会发生的，”她欢快地说。“普罗梅夫人工作太努力，想得太多了。我从不担心！此外，我认为她不会照顾自己。现在你听我的，让她多吃点柠檬。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上帝的柠檬那样对身体有好处了。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个简单的疗法，不过这是个很好的疗法。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柠檬和我的rink，我不会活到今天。”

我不知道她说的rink是什么意思，不过她给我看了，是某种使用汽或电的装置，她用来做饭的圆圈状的东西。

“靠很多柠檬和一个好的rink，”她说，“没有人会生病的。我穿越蒙古的时候都带着我的rink；没有它我简直活不下去。不要相信别人的食物！现在，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将打电话给街区的医生，他立刻会来。但是相信我，真正的疗法是上帝的柠檬。”

她讲完她的rink和柠檬过了好长时间才打电话给医生，助手说他立刻就来。不过接下来的六天里，不管什么时候我见到鲍罗廷夫人，她都要抓住机会重复她那关于上帝的柠檬的建议。

在照顾雷娜方面，我帮不上安娜·路易斯什么忙，除了在城里走来走去和等医生来之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几个小时过去了，医生还没来。雷娜已经醒过来了，完全地或是不完全地清醒，在昏暗的房间里安静地躺着。临近晚上，“街区医生”来了，是个让人厌烦的俄国人，带着两个助手和多得不可思议的随身工具，他们开始干活。这些人把房间都站满了，开始打开所有的管子，背包和器材，摊了一地。我被请出了房间，一个小时后才回去。

到了这个时候，雷娜断断续续地睡了，我听说她被用了天空醚——我偶然得知，就是那个让她病入膏肓。那晚剩下的时间里，她交替出现病重和神志不清的情况。我认为她应该立刻被送往克里姆林医院，安娜·路易斯也同意，但是没有鲍罗廷夫妇我们什么也做不成，我找不到他们。

第二天莫斯科被深深的积雪覆盖着，天很冷。德米特罗夫卡街的房子一夜之间变得让我无法忍受，每个角落都是雷娜的影子和声音。我那天早上搬到了萨伏伊。带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到了大都会，没想到雷娜竟然意识清醒又能笑了。她度过了一个可怕的晚上，身体非常虚弱，不过她将这归咎于天空醚。安娜·路易斯（如果有睡觉的话）睡在移到房间里的一张沙发上。那时我建议我们应该送雷娜去克里姆林，但是病人坚决反对。

“我很好，”她说，“是神经和那些头疼，仅此而已。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想要一个我能相信的医生。那天晚上我们告诉了那个蠢货天空醚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他还是同样给我用天空醚。”

听到这里，我出去找医生。那时我能相信的唯一一个人是华尔特·杜朗梯。我到他家的时候他还在床上，不过他坐了起来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坐着讨论的时候，一个美国人布鲁斯·霍珀（Bruce Hopper），也来了并参与了讨论。他建议我找德国使馆的医生，华尔特似乎也同意。

霍珀带着我冒着暴风雪乘电车去医生的办公室，大约半小时后我已经跟林可(Linck)医生在谈话了。我对医生或是德国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那个冷静的、不易激动的人，说话慢条斯理，深思熟虑，跟他相比，前一个晚上那一票大呼小叫的俄国人就像一群猴子一样。林可医生答应我尽可能快点来，我就回大都会了。

那天我们把雷娜移到了她自己的房间。她拒绝找专业护士，也不肯去克里姆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桑娅（Sonya Vep）轮流照顾她。桑娅——真名是Veplinova 或是Veplinskya或是类似的名字；我们总是称她和她丈夫为Vep——她是个文雅的、声音甜美的俄国人，是个在中国工作的革命活动者的妻子。Vep自己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名医生，跟桑娅一样文雅。他们和安娜·路易斯做了该做的一切，因为我笨手笨脚，一点忙都帮不上。我唯一擅长的事就是坐在房间里，即使是这样（当雷娜睡着了，房间里十分黑暗的时候）也几乎让我发疯了。

林可医生来过之后，雷娜又快活起来了。她对他也很有信心。她感觉好些了，窗帘拉了上去，房间变亮了。很多人来看她——孙夫人、鲍罗廷、章克、斯科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5]、路易·费雪（Louis Fischer），还有其他人。孙夫人对《纽约时报》事件的情绪在她听说雷娜的病的时候就烟消云散了，那个星期她每天都来看望雷娜。她们谈到了很多计划，还有在我看来是最有希望的事情——可以使一切都免遭破坏的事情——孙夫人去美国的可能性。如果她这么做的话，她希望雷娜跟她一起去，那星期中间有两三天，我让自己相信所有问题最后都能得到解决，尽管我跟林可医生谈话的时候经常看到他眼里的沉重。

11月13日的那个星期不像前一个星期那样难熬。林可医生禁止在雷娜房间进行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讨论，并让她答应听从他的嘱咐，这让病人笑了起来。

“你能告诉我，”她一边戳着枕头一边说，“如果政治讨论被禁止，那莫斯科的人都谈点什么呢？我不记得任何别的话题了！”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别的话题，整个星期，那些谈话——从没涉及政治——不论在这种情形下是多么难想出来，都让人很开心。我们谈到了太阳下面除了政治之外的一切。她给我讲了她童年在芝加哥的漫长故事，还有她深爱的混蛋弟弟。我从没在早上去她那里，我下午去的时候，她总是已经想好了要告诉我点什么。偶尔，我给她带点非政治性的小报信息，西奥多·德莱赛最新的关于共产主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集会的叙述，或是爱森斯坦的新电影。那星期几乎是愉快地度过的。在林可医生来过之后，并且与孙夫人和解之后，雷娜心情很好，有时情绪很高，我几个月以来都没有听到过她像那几个下午那样的笑声了。安娜·路易斯一个星期以来作为朋友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接近周末的时候，她很紧张，也很疲劳，我们都认为有Vep夫妇和我，我们周五没有她也能行。

那天我们一定是谈了一个下午和差不多一个晚上。我经常想停止谈话让她休息，但她觉得比之前很长时间感觉都好多了，躺在那里回忆早年的无数故事让她很愉快，那些故事大多数我都没听过，很有意思。那一整天，“革命”一词只被提到过一次。那是她突然想到两年前陈友仁在北平向她告别，他是在办公室门口说的，他要逃往广东：

“革命是伟大的，”然后，庄严地说：“国民党不会忘记！”

回忆这些我们都无能为力地笑了。

她还讲了很多关于比尔·普罗梅的事情，现在他在几千英里外的马尼拉，她对他的感情和忠诚始终如一。她甚至口述了

一封信给他，信中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但很快就会好的。

那天晚上她的病急转直下，进一步恶化，尽管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病，但是病情的严重是再也掩盖不了了。她一晚上情况都很不好，早上客人不允许来探望。星期六下午我和她单独待在一块的时候，她用很低的声音跟我说话，我得凑过去听她说什么。

“医生认为我已经不能自制了，”她说，“那是最糟糕的事情。他不会这么说，但是他是这么想的。他拿着手表在我眼前晃，测我的反应的时候我感觉得出来。他认为我没法集中精力在任何东西上了。”

她以前也含糊地谈到过害怕，我能做的事是说我觉得那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第二天（11 月 20 日星期天）她明确感觉到情况就是这样，那让她陷入沉默，几乎害怕说话，甚至是跟我。在那间黑乎乎静悄悄的房间里，我坐在她身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黑暗压在我们的身上和心头。有两三次她提高嗓音说:“别告诉任何人。”我知道那意味着她害怕自己的思维已经受影响，我答应她不说。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又聊了一会，她突然同意我几天前的提议——就是当她能够旅行的时候她应该去德国接受治疗。近晚上的时候她说：“现在我要睡一会儿，我醒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电报了。”我再也没有听到她说话。

林可医生晚上来了，并说专业护士必须立刻到位。护士来了，坐下来。桑娅和 Vep 几乎整晚都待在小前厅里，安娜·路易斯也回来了。房间完全黑乎乎的，没有一点声音。我因为恐惧而茫然，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来了又走了；在红场上走；去莫斯科夫斯卡亚喝伏特加；一次一次回到大都会跟她说话。晚上雷娜醒来过一次，向桑娅问起我，但是我在穿越广场。我到房间的时候，她又昏迷了。我猜想她是想让我发电报。

医生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说：“我预期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它有它的过程。”尽管这些话我听得很清楚，后来安娜·路易斯也向我重复过了，但是我脑子里一片茫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早上三四点的时候，我转过街角去萨伏伊旅馆， 然后上床。

那天早上七点（11 月 21 日，星期一）我房间的电话响了。是安娜·路易斯的声音。

“你最好过来。雷娜死了。”

17

雷娜死于 192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于 11 月 24 日星期三（感恩节）火化。我在葬礼的第二天就离开了莫斯科，从那之后再也没回去过。

要让整个身心都感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是需要点时间的，雷娜死的那天，我很平静。安娜·路易斯和我花了一天时间发电报和信件，跟来的人交谈，安排一切，在没有比尔意见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好葬礼的一切。最后鲍罗廷的秘书接手了一切安排事宜，我除了等待之外没什么事情可做。

那天晚上有一场暴雪，我在外面雪地里待了很长时间。如果我已经把那些现在已经解开的心理挣扎阐述清楚了，那么就能理解雷娜的逝去对我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我的世界里失去了一个人。这荒凉的暴雪之夜暗示了这一点，因为独自思考从没有被做到（即使我曾经有思考的能力）；白白的雪，空荡荡的夜晚，我在寒冷的空旷中迷失了，这寒冷的空旷使我们偏离了作为理性的人类所应保持的平坦的路线。我透过这雪清楚地看到了她，就像我现在看到面前的桌子一样，听到了她如铃的笑声和她说的话：“别做个让人讨厌的傻瓜，吉米。”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我试着不做让人讨厌的傻瓜，但并不成功。有时这些幻觉就像我们生活中的真实片断一样，

我在萨伏伊饭店那个上了锁的房间里，与那个将在一两天后被埋入泥土的女孩子进行过长谈；日子一天天过去，而这周而复始的混乱却没有结束，不做让人讨厌的傻瓜，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离开莫斯科。

一群莫斯科教授在 11 月 22 日进行尸体解剖，结果并没有让我吃惊：雷娜死于脑炎，脑部的感染。一定是几个月前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她确确实实，被烧成灰了，就像她丢弃的外套一样要在火葬场被烧成灰烬。如果不是被火焰吞噬，人类是无法说明火的性质的。

葬礼的那天下午，我们穿过莫斯科走了好几个小时去新火葬场。中国、俄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来了，他们中很多人都不认识雷娜。天气很冷，我向前走的时候看见了孙夫人那颤抖的，微微弓着的身影。她从中国的经济来源已经被切断；她很骄傲不肯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连冬衣都没有，穿着一件单薄的深色斗篷，穿过沉闷的，结冰的街道。苏联外交部拨给她用的一辆小汽车跟在队伍后面；至少车子里可以暖和些。我试着劝说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双臂抱在胸前，低垂着头，美丽的脸庞面向胸前，走完了每一步。她几天前才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脸色苍白到了极点。穿过寒冷的薄雾，一切都在前进，我意识到宋庆龄现在是最孤独的流亡者，在刚开始降临的黑暗中，她颤抖地走在她无私的朋友的棺材后面。乐队演奏的是——走调的——革命的葬礼进行曲。最后，——现在天黑了，附近修道院的大钟敲响了做晚礼拜的钟声——我们来到了城外现代化的火葬场。那里灯火通明。雷娜的棺材，包着红旗，盖着金色的花、紫菀、菊花，所有的花都是雷娜自己的颜色，一堆金色的、红色的和棕色的，放在了讲台上。其间有中文、俄文和英文的演说，英文的听起来跟中文和俄文的一样毫无意义。然后，信号出来，开关打开，雷娜金色的遗体、她的头发、她的鲜艳的花、还有红旗，在我们眼前慢慢沉入炉子里。

那天晚上，鲍罗廷来看我。他在我狭小的房间里一边慢慢走来走去，一边说话，看上去很庞大。我在床上，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了。他是来告别的，他说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没有去参加葬礼。原则上他从不去参加葬礼。必须将思想集中在目标之上。

他说得很动情，很艰难地才控制住。他没有看我，而是从窗走到门又走回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他说，“我确实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的是长远的观点。我来就是要让你持一种长远的观点——中国、俄国……一个极好的朋友，极好的革命机器，一起消失了。但是，除非我们持长远的观点，否则一切都无用。记住，中国、俄国……”

过了一会，他握了握手，走了。早上，我上了去柏林的火车。

[1] 华尔特·杜朗梯（Walter Duranty，1884-1957) 1922 到 1934 年担任《纽约时报》分管苏联新闻的记者。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

[3]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也是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4] 库恩·贝拉（匈牙利语：Kun Bela，1886-1939)，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犹太人。

[5] 斯科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1886-1985），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及环境与生态保护倡议者之一。

“蓝天下的至爱”——宋庆龄故居开展慈善义卖活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7 日，为响应“蓝天下的至爱”系列慈善活动组委会的号召，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开展了慈善义卖活动。最终义卖共筹得善款 2350 元。义卖后剩余的书籍和文具用品故居也将通过本市慈善基金会赠送给困难学生。



宋庆龄故居推出“以鲜花代门票”纪念宋庆龄诞辰 119 周年

2012 年 1 月 27 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推出“以鲜花代门票”免费参观活动，以纪念二十世纪伟大女性——宋庆龄诞辰 119 周年。

免费参观活动不仅吸引了许多远方游客，一些市民也纷纷走进故居，在宋庆龄女士的雕像前敬献鲜花。虽然当天天气寒冷，又有小雨，但前来宋故居参观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全天接待游客近 400 人次。

原武汉市政协副秘书长袁宏菊等来宋庆龄故居考察

2012 年 1 月 31 日，原湖北武汉市政协副秘书长、汉口宋庆龄旧居纪念馆馆长袁宏菊一行 6 人，在武汉市人民政府驻沪办同志陪同下，前来我馆参观考察。

我馆党支部书记陆柳莺、副馆长董卫热情接待了客人，并向客人们详细介绍了我馆的陈列设计理念、文物展示手段，以及如何妥善解决安防监控系统安装与保护老建筑风貌的问题，并陪同客人们参观了宋庆龄文物馆、故居主楼各展厅。客人们仔细观看陈列文物，不时询问和讨论文物背后的故事，当看到宋庆龄在武汉所拍的照片时，袁宏菊馆长向大家介绍了照片拍摄的地点和背景。袁馆长表示：此次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考察，收获颇丰，在汉口宋庆龄旧居纪念馆开馆前，还会再来参观学习。他希望，通过此次参观考察，与我馆建立长期交流合作的关系，共同为宋庆龄文博事业做出新的成绩。

最后，客人们在故居花园草坪上合影留念，陆柳莺书记向客人们赠送了《上海宋庆龄故居》、《国之瑰宝——宋庆龄文物展》画册。

“为故居增色 为梦想添彩”——宋庆龄故居开展少儿填图活动

近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开展了以“为故居增色为梦想添彩”为主题的少儿填图活动。该活动主要面向学龄前儿童，旨在通过活泼有趣的填图活动，加深孩子们参观故居的印象，同时培养他们的艺术兴趣，让参观的过程成为一次有趣的体验活动。

故居工作人员选取了故居最具代表性的主楼建筑、香樟树和鸽子作为活动题材，并制作成具有故居特色的填图卡。孩子们在参观结束后，可以来到设在临时展厅的画桌前，选择自己喜爱的图样，根据自己的创意涂上颜色。该活动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自 2 月初故居推出此项活动以来，已经吸引了近百位小朋友的热情参与。





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一行来宋庆龄故居检查文物安全工作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率领文物局直属部门和市财政局、公安局有关部门负责人等一行 8 人，来我馆检查文物安全工作。

检查组检查了我馆故居主楼、文物馆、花园、监控室等处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听取了我馆展馆建设、基本陈列以及安全防范措施介绍，检查了我馆安全记录台帐。褚晓波副局长等检查组成员对我馆的安全防范系统以及我馆安全工作表示满意。

来华访问的布隆迪良政与私有化部部长一行来宋庆龄故居参观



2012 年 3 月 22 日上午，应国家监察部邀请，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布隆迪良政与私有化部部长伊萨·恩冈达库马纳率领的访华团一行，在国家监察部外事局负责人，上海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市预防腐败局局长顾国林等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宋故居副馆长金晓春、董卫热情接待了客人，参观结束后，伊萨·恩冈达库马纳等一行来到故居的草坪上与故居领导合影留念。

布隆迪是非洲中部国家，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人口 830 万。该国良政与私有化部主要负责监督政府部门廉洁、高效运转，制定反腐败战略，调查重大腐败案件，推进私有化进程的工作。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到宋庆龄故居参观考察

2012 年 3 月 26 日下午，前来参加上海对台工作暨先进表彰会的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一行，在中共中央台办秘书局局长杨流平、市委台办巡视员纪平、市孙宋文管委副主任秦量等领导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考察。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董卫热情迎接王毅主任一行，并陪同参观了故居主楼、文物馆、花园等。王毅主任对宋庆龄故居陈列展品非常感兴趣，认真听取了讲解员对宋庆龄故居以及展品的介绍，不时对展品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王毅主任对宋庆龄故居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增进两岸人民友谊所做的努力给予了肯定。

参观结束时，王毅主任与陪同人员一起在故居草坪上合影留念。



国家旅游局检查宋庆龄故居 4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

2012 年 4 月 15 日，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规划与资源处副处长潘肖澎一行，在上海市旅游局和徐汇区旅游局领导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检查 AAA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情况。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金晓春、董卫热情接待，并陪同检查。

自宋故居创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以来，宋故居认真对照创建标准，持续开展旅游环境整治工作，在游客服务、安全卫生、综合管理等多个重点环节进行了持续改进，旅游景区的形象和服务品质明显改善。


主 编 金晓春
副主编 陆柳莺 董 卫
策 划 麦灵芝
执 行 王宁宁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